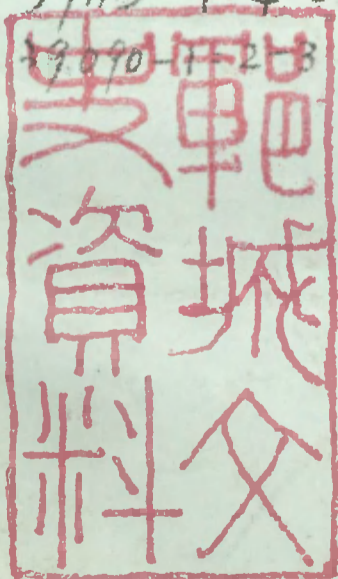


鄆城文史資料

第四集

D622.4
135

91-39113-4:4-5



郓城文史资料

第四集

山东省郓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元月

目 录

- 访苏回忆……………陈宗祥（ 1 ）
- 杀日寇打汉奸气吞山河 黄楼村十民兵
为国捐躯……………王瑞迎 黄洪荣（ 15 ）
- 强度黄河首战告捷 我军全歼郟城守敌
……………王瑞迎（ 23 ）
- 泮渡伏击战……………刘元高（ 28 ）
- 抗日将领罗明星……………侯宪起（ 40 ）
- 孙厚甫对鲁西南的影响……………许贯中（ 46 ）
- 抗日从军生活片断……………郑和甫（ 49 ）
- 投笔从戎的八年……………于长茂（ 63 ）
- 红枪会抗日史略……………马玉斋（ 82 ）
- 清末和民国时期郟城的放帐铺…王锡亮（ 87 ）
- 万春堂药店和龚氏家族……………苑仁祥（ 95 ）
- 关于政治大队的始末……………郑和甫（ 103 ）
- 郟城“民七”之乱……………李树林（ 107 ）
- 他从乡间走来
——记我县已故著名民间艺人唐玉生
……………李秀民（ 113 ）

状元张宪周.....	杨彩云 苗冠五	(121)
深受拥戴的知县戴茅草.....	赵洪玺	(124)
郓城天主教的创建、发展和现状		
.....	侯京起口述 王锡亮整理	(130)
郓城水浒酒厂的历史渊源及现状		
.....	祝令才	(133)

访苏回忆

陈宗祥

1952年是我国建国后经济恢复的第三年。这一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全党开展了“三反”、“五反”的斗争。正在进行“三反”第四次战役的时候，党和国家决定组织中国农民访苏代表团赴苏参观学习农村工作经验。代表团的规模较大，约200多人，当时我县属平原省，全省共8人，我是被荣幸的选派人之一。带队的是当时省委办公厅主任王庭栋同志。赴京前先去省府新乡市报到。当时省委书记潘复生接待了我们，他讲了访苏的重要性，并说这次赴苏联参观是代表全省人民，是极其光荣的任务，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到北京集合后，经过数日学习准备，于4月17日乘专列火车出国。当时途径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至满州里，然后换乘苏联火车西征。火车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后，沿途除丘陵荒山外，基本上看

不到其他东西。大约跑两天的时间，即进入森林地带。人烟稀少，除在火车停车时看见稀稀的人外，没有村庄集镇。但森林非常稠密，一眼望不到边。那树木粗的一人抱不过来，细的似檩条。看到有人烤火，单选好的烧，用直丝直棱的，地上树叶脚脖深。由于树多，木材丰富，房屋都是木制的，底部横排几行，中间立着排，上顶用草或铁皮复盖。据说外边火车进入西北利亚和贝加尔湖地区，这里的风景则是阴森凜凜，此处是比较冷的地方。在我国东北已是春种大忙季节，在这里则是一片白茫茫冰天雪地，特别是贝加尔湖，称为世界最大的湖。我们沿着湖边西进，一面山、一面水，经过几十个山洞到达“叶尔库斯克”天气才逐渐温和。又经过两三天欧州平原地带，最后才达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受到苏联农业部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们在火车站举行欢迎仪式，由少年儿童献鲜花，给团长和劳模李顺达、吕鸿滨等同志的鲜花都抱不起来了。苏联的礼节，初次见面是拥抱亲吻礼，我们则不习惯，表现不大自然。之后，即专车送莫斯科国际旅馆住下。

休息了几天后，团内开会，准备参观游览，交流经验，确定行动计划。我们提出要看的地方，他们大体同意。最后由苏联农业部把活动计划复印发给各代表分团。四月底，苏联农业部举行国宴招待我们。宴席桌上摆的东西不少，每个座的前面有各种美酒，菜有大碗，也有小碟，面前放着叉子、勺子、刀子三大件，随使用。饮酒没经验，会喝的开始不多喝，留着量与苏联同志碰杯。由于我不能喝酒，一坐就和咱的同志坐一块，这样好说话，他们就不让了。宴会上好热闹，喝一阵酒，跳一阵舞，再喝一阵酒，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约五六个小时，说起来是件愉快的事，实际上精神负担太大，我感到很不适应，却又不能有异常表现。

5月1日，参加苏联庆祝劳动节的活动，从早饭后至下午两点，多半天在红场观礼台上站着，这是一件荣幸的事，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民领袖斯大林同志在主席台上不断地与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们站在观礼台上，时间较长感到有些疲劳，但精神上是兴奋的，尤其当看到

游行队伍中，中国的同志好远就向我们招手，我们也热烈地向他们招手致意，这也使我们受到鼓励。虽然累些，但心情始终是愉快的。次日的行动计划是参观莫斯科汽车厂，苏联的小型汽车厂，生产完全是现代化、自动化，各个车间，指挥生产的几乎看不到人。从翻砂、红炉到装配成汽车，全是机械化、自动化。每隔几分钟就开出一辆，看起来就象仓库里存着无数汽车一样。

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它是苏联历代皇帝工作休息的宫殿，建筑雄伟，设施豪华，属著名的西方古老建筑之一。凡到莫斯科的朋友，一般均要看看此处。它与我国的故宫相比，各有千秋，宫内保留着不少古老的东西，十世纪的大钟大炮，一人抱不过来的钟，数十人抬不动的炮筒，人可以通过炮筒爬过去，看过后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游览了市内运河，观看了市容。莫斯科运河通往市内，地下道在运河下四通八达。还看见苏联搬过家的楼房，六七层高的楼搬动是不易的。介绍者说，需要搬家的房子是比较

有纪念意义、有保留价值的，所以才采取搬家措施。用什么办法搬？周围挖空，底下用强固的钢板，用高效率的起重机。当搬迁时，室内的人照样可以办公。

接着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列宁大学，这两处的参观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看博物馆时还带来一批列宁生活像，至今尚有保存。列宁大学建立在列宁山侧，是摩天高楼之一，近四十层，规模很大，能容万名学生，每人能有一间宿舍。我党不少革命前辈，曾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

我们拿出一晌时间瞻仰了列宁墓。这对我是一生印象最深刻的教育。亲眼看到这位离开人世已几十年的无产阶级导师，现在仍象工作一天，晚上睡在水晶棺里一样安祥！列宁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4年，享年54岁，由于被刺却过早地离开了苏联的党和人民。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夺取了俄国沙皇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指挥并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帝俄的复辟和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苏联内

政的梦想，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为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乘坐了地下道电车，上下地铁乘坐了自动电梯。地铁站修建得很好，美观大方，旁边还有办公室、商店，能买到许多东西。这里和白天一样，非常明亮，通风设备好，不感觉闷得慌。人们乘地铁上下班比在上面街上走还快呢！世界不少国家有地下铁，我国北京从六十年代也建立了地铁，当时我的战友赵其柏同志，曾被派到列宁格勒学习了一年，回来后亲自指挥修建了这条地铁。

还看了莫斯科外貌，粗略地看了郊区的居民区，城市虽大，但居民住的不拥挤。

我们还听了苏联农业科学方面的报告，并组织讨论，中间还听了首任住苏大使、参观团临时党委书记、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志的报告。他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情况和学习苏联应抱的态度。在一个晚上，还到我国大使馆看过一次电影，又一次见到张闻天同志，他平易近人，与不少团员啦家常，问好几位同志是哪省

哪县哪村的，到苏联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想不想家……。

在庆祝五一游行中看到不少中国留学生，当他们看到观礼台上中国农民代表团时，手举得特别高，一再招手致意，会后不少学生到代表团住地看望，并主动写下详细通信地址和姓名，要求有机会一定去他们住处玩。因留名的学生较多，现在想不起来名字。在此期间，还看了不少文艺节目，除不断参加舞会，还专门组织观看了几次电影和戏剧演出，但都是用俄语说话，大都看不懂，听不明白，由于翻译人员不足，开会参观时能够做到俄文翻中文，但文艺节目则及时翻过来的很少。所以，文艺晚会只起到开眼界、见世面的作用，晚会所演的节目都是选择优秀的，其中有大型的天鹅舞、历史剧，也有小型的精彩节目，苏联同志看到精彩节目时笑得前仰后合，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则不能很好理解意思。

我们被安排到莫斯科市中心国际旅馆住宿，让我们一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大一点的有30个平方米，小点的也有20个平方，房间设备很

好，地毯铺地，写字台、沙发床、俄国毛毯，电灯电话，还有吸尘设备，有了脏东西，随时可以清除。还设有长短沙发、坐椅、有电铃、衣橱、卫生间，我一人住一大间。莫斯科作息时间与我国作息时间不同，他们晚上休息很晚，一般约在夜里十二点以后睡觉。刚到时很不习惯，早七点就起来了，拉开窗帘还看不到街上有行人、车辆。上午九点才用早餐，午餐四点，晚餐十点，这是城市作息时间，到农村就不是这样了。

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一段后，决定分五个分团，于五月下旬分别去东西乌克兰、哈萨克、阿萨拜疆、格鲁吉亚等参观访问。我们华北分团赴西乌克兰参观，东北分团去东乌克兰，由莫斯科出发，先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基辅（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在这里受到共和国领导的热情接待。在基辅参观一星期时间，去农庄十余天。亲眼看到基辅的市容，该城市是个很美丽的城市，绿化得比较好，不次于我省的青岛、济南，和天津差不多，是个工业城市，地处乌克兰的中心。是苏、德战争时

两方必争之地。这里的土地广阔而肥沃，农庄分布疏散，从这个农庄到那个农庄，就有十几公里。在这里没感觉到从共和国到基层（农庄）有多少层次，中间只有省区，没有县和专区，由区直到农庄，田间工作队、庄员。从这里参观结束后就到另一个省城傲德萨，这在乌克兰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紧靠黑海。该城有山有水，是避暑的好地方，苏联领导人不少在这里渡过炎热的夏天。看到乌克兰大地正处在麦收，到处是联合收割机，从收割、脱粒到烘干，全部自动化作业，在这里看到从城市到乡村男劳力是比较少的，田间工作队是妇女。我们问为什么男劳力少，他们告诉这是苏德战争的结果。这里还保留着德国进攻时炮弹击坏的楼房，全是一片废墟，他们保存着以教育年青一代。在这里参观时，苏联同志告诉我们，1941年，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一天就杀死苏联十万人，敌人的凶狠和残暴，激起了人民的无比仇恨，而人民对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同志也就更加热爱。

黑海的对面就是土耳其，一海之隔，两个

天下，两种制度。在这里除参观农庄外，还参观了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及农业技术学校等。之后，就到乌克兰地区另一个城市德聂波尔得洛夫斯克城。参观农庄时，一天下了雨，被迫住宿庄员家，借此机会看了庄员家庭的生活情况。我和刘振方代表住在一户庄员家，这家庄员人口不多，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未见老人和小孩。主人让我俩睡在一个双人钢丝床上，用的全是新被、新毯子。主人住另一个房间，中间是走道，大屋套小屋，看来也有好几间，是属于苏联农庄的标准房间，但没有院子，这房到那房有一定的距离，由于土地宽绰，房周围就是园地。国家规定每户可种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公顷作为自留地，光种这块地也能维持生活。由于语言不同，我俩在此住了一宿，中间没有翻译，双方说话打手势，没有在庄员家用饭，天一明就起来告别了主人，回到集体住宿的地方。以后又参观了几个农庄，就去基洛夫格拉城。这是我们参观团最后参观的一个城市，该城市和我们济南差不多。在这里参观不论城市或乡村、工厂或学校，拖拉机站或农

场，他们事前有详细的安排。从农庄主席介绍情况时可以看出有汇报提纲，我们提出的问题，对方也有现成的回答，有困难时也说找下资料再告诉。但不管怎样，对待我们的参观访问，非常热情认真。

结束了以上几个大中城市和十余个农庄的参观访问，就又回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到共和国农业部告别，在这里举行二级国宴招待我们，并组织了精彩的文艺晚会，演乌克兰民族舞，并用中文给我们唱歌。代表情绪激动，气氛友好，多次热烈鼓掌致谢。宴会上，还每人送给一部“福特牌”像机和乌克兰民族汗衫一件（带绣边的）。只华北、东北两个分团有这纪念品，其他分团没有，因为这是乌克兰共和国赠送，其他加盟共和国则是送其他礼品，但也是很珍贵的。例如去哈萨克分团的，每人送给一身民族服装，并有红锦帽。我们赠给苏联的礼品是列宁、斯大林领袖像纪念章，他们对此也很满意，告别时，一再握手，招手致意。

近三个月的乌克兰农村参观访问结束后，

五个分团同一天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这十余天的活动主要是代表团的内部活动，与苏联农业部牵扯不大，但农业部的一位局长乌西科夫一直陪同我们，每日都到我们住处问寒问暖。代表团的活动先由小组座谈，然后分团汇集情况，并抽出专人整理材料。我分工专门整理农庄、政治工作经验。

这段时间，一方面做材料汇集，另一方面做回国的准备。回国前，苏联农业部再次设宴招待我们，并每人送毛呢衣料一身，留声机一部，我自己还买了一些纪念照片带回。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按护照规定时间在苏联活动四个月，于八月下旬乘专列起程回国。在途中，有这样几件事尚能记忆。

（一）苏联农业部对我国代表团的访问负责到底的精神是可贵的。我们回国的路上，仍有农业部的一名局长一直陪送到满州里。（二）回国的路上同一位朝鲜中年女同志乘坐一列车，她一再表示感谢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的援助，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崇高精神，并一再要求我们的同志

有机会去朝鲜访问，实际上我们当时已派代表团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了，（我们菏泽地区的代表是樊瑞卿、万庄等同志）。（三）乘坐七天七夜长途火车回到满州里，四个月没有用中国餐，入国境又吃用上了中国饭，虽系便饭，肉丝面条、馄饨，但味美可口。

经过三天三夜，回到我国首都北京，到此算是较顺利地完成了赴苏参观的任务。

回到北京后，参观团进行了访苏总结，并先后听了农林部、组织部张林池、安子文等同志的报告，研究布署了回省后如何进行宣传的问题。十月份，平原省省委组织了中苏友好宣传月活动，我们几位访苏代表先后到菏泽、湖西、新乡三个专区的各县作巡回报告，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当时对加强中苏友好关系，开展向苏联学习，促进我国农业合作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宗祥：现年64岁，1942年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菏泽地委宣传教育科副科长、菏泽地区记者站组长、菏泽地区拖拉机站副站

长、菏泽专署农业局、农机管理局副局长、郓城县革委副主任、鄄城县革委副主任、县人大副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

杀日寇打汉奸气吞山河 黄楼村十民兵为国捐躯

王瑞迎 黄洪荣

在抗日战争期间，郟城县人民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歌颂的壮丽篇章。黄楼村十民兵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与日寇汉奸进行殊死战斗，直至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就是光辉的一例。

黄楼是郟城县西北45华里外的一个村子（村北是小龙寺大洼，村西北12华里是临黄大堤）。全村80户，400口人。从抗战初期，该村就是我党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个村子。村里党群组织健全，党支部班子坚强，群众阶级觉悟高。1939年3月，村里就建立了党支部，1943年7月，全村党员已发展到30多人。在党支部

的领导下，全村的民兵、自卫队、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抗日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村男女老幼自发抗日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当然也就引起了日伪汉奸的仇视，再加上该村当时处于边沿地带，因此便成了敌伪向我中心区进行蚕食的一大障碍。

1943年是冀鲁豫边区人民最艰难的一年。死心塌地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郟城县伪县长刘本功，疯狂推行日寇蚕食我解放区的反动政策。8月1日，驻侯集据点（位于黄楼东北18华里处）的伪军，在其大队长范保山的带领下，同刘口、肖垓等据点的四百多伪军，携带小炮数门、机枪数十挺，从东、南、北三面突然包围黄楼村。面对三面受敌的严峻形势，村支部书记张金建和自卫队长张绍兴，当机立断，率领全村的十五名基干民兵上村寨墙御敌。同时掩护全村群众撤退。上午7时许，一场保家护国的战斗打响了。“枪声就是命令”，汤垓村（位于黄楼西6华里处）民兵听到黄楼村的枪声，立即集合起来，在汤景高的带领

下，快速奔赴黄楼增援。9时左右，汤垓的十一名民兵冲破敌人的阻截，从楼黄西门冲进村里。这时部分敌人已突破民兵占领的村寨墙进入村内，黄楼民兵已从村寨墙上有计划地撤退到村东西两头的两个四合院里。汤垓民兵打进村后。在黄楼村的大街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不幸汤景高在战斗中负重伤。他撤退到一个厕所里仍继续与敌人战斗，最后壮烈牺牲。汤垓的其他民兵因寡不敌众，边战边退，陆续从黄楼村西门撤出。

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陆续占领了黄楼村周围的全部寨墙。接着，便调集多于我数倍的优势兵力向退守在村东头路北四合院的民兵发起进攻。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我民兵利用房顶四边砖砌的花墙为屏障，以手榴弹和砖瓦为武器，和敌人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敌人开始是从巷子南北两端向这个四合院进攻。我民兵沉着应战，巧妙地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敌人又进攻，又被我击退，如此连续三次，敌人死伤十多人。民兵们英雄顽强的抗敌精神，使穷凶极恶的汉奸队恼羞成怒，最后他们竟改为

火攻战术——搬运了群众的大量烧柴、木板等物堆放在我民兵占领的四合院平房四周，放火烧房。一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数十里可见。四合院的房子燃烧起来，熊熊的烈火威胁着民兵们的生命。在外有强敌重重包围，内无存身之地的极端困境中，英雄们没有屈服，个个气冲斗牛，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民兵班长共产党员张金良带领民兵张光义、张宝柱一齐从房上跳下来，冲入敌群，经过激烈搏斗，壮烈牺牲；共产党员黄承业腹部受伤，手捂伤口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投降！”与敌人搏斗，壮烈牺牲；民兵张光德手持长矛只身冲入敌群与敌人拼刺，以身捐国；民兵张绍兴宁死不屈，负伤后投火自焚；民兵黄广明机智勇敢，隐蔽在屋后，敌人进屋时他猛地跳出来一气刺死刺伤几个敌人，后中弹光荣牺牲；张金建（村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张金榜身受重伤被俘，受尽酷刑，坚强不屈，被敌人活埋；张绍堂腿受重伤隐蔽在锅坑内未被敌人发现，后送我分区医院医治无效光荣牺牲。

这次战斗从上午7时许打响，一直持续到11时。下午1时左右，位于黄楼西15华里的傅庄、洼刘庄、孙沙窝等实验区的民兵数十人赶来增援。实验区民兵占领王庄（位于黄楼村南两华里处）后，在村北寨墙上一齐向进占黄楼村的敌人射击。不久，敌人从黄楼撤走，我撤退在黄楼村西头路北黄玉珍家四合院里的一部分民兵和群众，未被敌发现。

在这次战斗中，我11名民兵光荣牺牲，敌人死伤20多人。党对黄楼村民兵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地人民群众为了纪念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民兵英雄，把他们称为“黄楼民兵十英雄”。

黄楼民兵在抗日战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誓死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气节和英勇顽强、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黄楼战斗迄今已40多年，但是，民兵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仍在鲁西南大地广为流传。烈士们那种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烈士们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附：黄楼民兵十英雄简介

张金建，1920年生，1940年入党，牺牲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1942年为反日寇蚕食斗争，保护群众财产，带领民兵割电线、平封锁沟，除奸反霸，打击敌人。在黄楼战斗中，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受伤后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强不屈，后被敌人活埋，年仅23岁。

张金良，1916年生，1941年入党，牺牲前任黄楼村民兵班长。在黄楼战斗中，子弹打光后，率领民兵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并上房揭砖瓦倾砸敌人。敌人烧房，他又带领民兵张光义、张金榜从房上跳下与敌人搏斗，因寡不敌众，光荣牺牲。

张绍兴，1907年生，1939年入党，牺牲前任村民兵队长。在黄楼战斗中，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负伤后投火自焚，壮烈牺牲。

黄承业，1924年生，张鲁集乡黄楼村人。1939年入党。在黄楼战斗中，腹部受伤，忍着剧痛，手捂伤口与敌搏杀，并高喊“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投降！胜利一定属于我

们！”等口号。身受数弹，壮烈牺牲，当时只有19岁。

黄广明，1912年生，1939年入党，任村民兵班长。在黄楼战斗中，机智勇敢，隐蔽在屋后，待敌人进屋，跳出来刺死刺伤敌人多人，后中弹光荣牺牲，年仅31岁。

张光德，1926年生，张鲁集乡黄楼村人。在黄楼战斗中，英勇顽强，子弹打光后，手持长矛冲入敌群与敌人搏斗，因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当时才17岁。

张绍堂，1912年生，1940年入党，任村民兵副队长。在黄楼战斗中腿负重伤，后送我分区医院治伤，伤口复发牺牲。时年31岁。

张光义，1918年生，在黄楼战斗中，子弹打光后，从房上跳下来冲入敌群，经过激烈搏斗，壮烈牺牲。

张宝柱，1921年生，在黄楼战斗中与张光德一起冲入敌阵与敌搏斗，以身捐国，时年22岁。

张金榜，1921年生，在黄楼战斗中，英勇奋战，不幸被捕，在狱中坚强不屈，被敌人活

埋，时年22岁。

强渡黄河首战告捷 我军全歼郟城守敌

王 瑞 迎

1947年6月30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刘、邓首长的命令，强渡黄河首战告捷，于7月8日攻克郟城县城，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开创了一个纵队一次歼敌两个旅的新纪录，受到了野司首长的通令嘉奖。

1947年5月，党中央按照预定的战略方针，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于7月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在大量歼灭敌人之后，打通南进的通道，跃进大别山。一纵在豫北战役之后，经过了一个月的整训，从驻地出发，于6月29日进到魏山、张堂、林楼一线，准备强渡黄河，参加鲁西南战役。

敌人此时正在继续向山东、陕北进行重点

进攻，鲁西南处于防御态势，从河南省的开封至山东省的东阿县，约500华里的黄河防线，只有刘汝明之55师、68师和地方团队防守，兵力薄弱，并妄图以黄河之险，来阻止我军南进。当时敌人的部署是：55师守肖皮口、郟城、鄆城、临濮集地区；68师守菏泽、东明、开封地区；另有70师位于嘉祥地区机动。估计战役发起时，豫北、豫皖苏之敌可能迅速出兵来援。野战军首长决心发起强渡黄河作战，开辟鲁西南战场，先灭敌人的河防部队，然后适时转移兵力，歼敌援军，扩大战果。野司令冀鲁豫军区独1旅于6月27日秘渡黄河，30日拂晓在戴庙至孙口段接应一纵渡河：原在南岸的独2旅和鄆城地方武装，在旧城集、临濮集地区接应6纵渡河。1纵以1旅、2旅为第一梯队、19旅、20旅为第二梯队，在两个地段上渡河。1旅由张堂渡河、经肖皮口直抵郟城城郊；20旅尾1旅渡河后，经寿张集直插郟城东郊和南郊；2旅由魏山渡口，直歼灭戴庙、师集之敌后，进至郟城北郊和城西北侧，会同1旅、20旅歼敌；19旅尾2旅渡河，直插郟城城

东南之丁里长，准备阻击由嘉祥来援之敌。纵队指挥部随1旅前进。

独1旅先期渡河之后，立即派出了侦察分队，了解敌人在黄河南岸的布防情况，主力潜伏隐蔽。30日拂晓前，全旅秘密进到戴庙、师集地区，主力在东平湖之鹅鸭厂歼敌87团两个营。黄昏时，以一部兵力到达渡河地点接应1纵渡河。1纵遵照晋冀鲁野战军第16号命令，于30日19时起强渡黄河。渡河突击部队在独1旅的接应下，迅速控制了南岸滩头阵地，向敌后纵深猛插。7月1日，1旅进到郓城西南，20旅一部进到城东，主力逼近南关，2旅进到城北及城西北侧，19旅及骑兵团进到丁里长，纵队指挥部位于郁胡同。2纵主力进到郓城以西地区，以防敌人向西南逃跑。7月2日，即完成了围歼敌人的态势。

我大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地区之后，震动了敌人的统帅部。蒋介石一面令55师师长曹福林坚守郓城，一面从豫北和豫皖苏急调三个整编师和一个旅，并调在山东的王敬久前来统一指挥，分别向巨野、定陶推进，企图吸我屯

兵在坚城之下，从两路钳击我军。刘、邓首长将计就计，采取“攻敌一点（郟城）、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令1纵围歼郟城之敌，吸敌援兵北上，一面令2、3、6纵速速南插，分别攻取定陶、曹县和进占冉堎集、汶上集地区。

7月3日，1纵开始扫除敌人在郟城县城外圈的据点。是日，2旅5团和20旅分别攻郟城北关和南关。4日，1旅2团攻占西关。5日调整部署：20旅由南门实施主攻；1旅由西门主攻；2旅由北门助攻；19旅一部及骑兵团位于丁里长打援，旅主力逼近东关，暂不攻击，以诱迫守敌求援；独1旅位城西南为预备队。调整部署后，各部队加紧了攻城准备工作。为了吸引敌人的援兵北进，纵指决定暂缓攻战。7日，敌人右路主力的先头部队进到金乡，已到达我预想的位置。刘、邓首长令1纵向郟城之敌发起总攻。

总攻从7日20时开始，经过一小时的炮火轰击和连续爆破，敌人前沿阵地的火力点大部被摧毁，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我军随即发起冲

锋。1旅2团突击营（2营），从西门附近迅速登上了城墙，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冲锋，占领了西门，并巩固了突破口。团主力沿西大街向纵深迅速发展，在十字街口附近先后打退了敌师部两个连的连续反冲锋。3连8班班长龚子美，率领全班战士首先冲进了敌人的师部，以白刃格斗打乱了敌人的指挥机构，促成了城区战斗的速决。纵指令1旅入城部队分头接应2旅、20旅登城。2旅进城后，向东北城区进攻；20旅向东南城区进攻。8日5时，城内守敌一个师部两个旅被我全歼，计毙伤敌2500余人，俘敌副师长理明亚以下10500余人，缴获各种口径大炮100余门，轻重机枪500余挺，汽车20余辆，各种枪10000余支（敌师长曹福林换装逃命）。此战，开创了我军一个纵队单独歼敌两个旅的新纪录。

（根据二野五兵团军战史资料和其他史料摘编）

泮渡伏击战

刘元高

一九四一年一月的郟城，冰封大地，朔风呼啸。古老的黄河，失去滔滔东流之势。当年梁山泊好汉的水上交通要道宋金河，无声无息，犹如一面平滑光洁的大镜子，泛着碧玉般的微光，铅块似的浓重乌云压在头顶。太阳与乌云搏斗，偶尔给大地带来一线光明。巍峨的郟城古塔，引颈眺望。急切的期待，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的难耐的期待！

一月一日，范县付庄（今郟城县左营公社）。这里虽是北风刺骨，家家户户却是暖气微微。在一座农家小院低矮的堂屋里，土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一个中等身材的首长在向营连指挥员下达作战任务。他，就是在鲁西一带遐迩闻名的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雄健的身躯，浓黑的剑眉，深邃的目光，给人以干练洒脱之感。一根柳杆儿指着地图，声音着实

有力：“特务营担任佯攻，引蛇出洞。七团二营隐蔽在这里，发起攻击，阻击日伪援军，坚决夺取敌人步兵炮；七团一营在这里隐蔽，断敌退路，协同主力围歼敌人于梁家庄、碱场店地区；七团三营隐蔽在这里，战斗打响，占领大堤，阻敌东逃。旅骑兵连这样隐蔽，阻击郟城再次出援之敌，以保战斗顺利进行。二分区特务连、郟北县大队担任警戒，防敌逃窜。郟南县大队负责警戒郟城之地。总的要求是隐蔽要好，行动要快，穷追猛打，务歼敌人。还有什么疑问和困难吗？”杨勇司令员亲切的目光扫向全体指挥员。七团政委杨俊生、参谋长杨崐、程志杰，一营长温宪星、二营长齐丁根、教导员王猛，付营长李成等团、营、连干部和郟北县、郟南县游击大队长，一个个求战心切，信心百倍。“坚决完成任务！”异口同声的回答，震得小屋簌簌落土。

面对身经百战、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指挥员，杨勇司令员心潮起伏。为打胜潘溪渡伏击战，他运筹帷幄，早已成竹在胸。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后，罗荣恒政委亲帅师部和六八六

团，于一九三八年冬向山东进军。一九三九年三月，进入鲁西，消灭了盘踞郟城樊坝的八百伪军；同年八月二日，取得独山歼灭战的胜利，为开辟鲁西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郟北地区经我军对日伪顽军的斗争，到一九四〇年冬，除少数日伪据点外，广大农村已被我控制，群众已发动起来。不甘失败的日寇，疯狂反扑。日寇三十二师团一部不断在我鲁西各县增设据点，在郟城地区常驻一个大队，约四五百人，仅城内就驻有鬼子二百余人，伙同当地伪军，先后在侯集、肖皮口、任祥屯等地设置据点，企图钳制我游击队，封锁我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日寇、伪军，经常乱窜乱闯，奸淫烧杀，抓人抢粮，许多无辜群众，被抓被打，扒心剥皮，残忍之极。人民群众恨透了敌人，日夜盼望八路军到来。如今，我野战军一一五师三旅九团途经侯集以西，南下开辟钜南，良机难逢。杨勇司令员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给日寇以致命一击。当天，杨勇司令员就率领参战的教三旅骑兵连及特务营、七团和冀鲁豫二分区特务连的营连军政干部，伪装成

九团之侧翼警戒部队，进至侯集、郟城间，沿公路两侧进行了详细的地形勘察。杨勇司令员谙熟敌人凭坚固守、受袭必援的特点，依据敌出援时可能经过的道路，在郭家垓、泮溪渡之间选定了设伏区，制定了这个“围点打援”的完整的作战方案。这次伏击战，既有我主力部队参战，又有地方武装配合，群众基础较好。想到即将到来的胜利，杨勇司令员脸上洋溢着一种镇定自若、胜利在望的微笑。

现地勘察后，一连四五天，郟城一带平静得出奇。我军一下子踪影皆无，似乎去向不明。我军的伪装侦察，麻痹了敌人。敌人也许真的把我参战部队当成路过此地的我三旅九团侧翼警戒部队了。其实，平静的帷幕下并不平静。集结在范县龙王庄一带的我所有参战部队，战斗准备在紧张地进行。从晨光曦微，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争分夺秒进行模拟演习。伏击位置，动作，攻击队和火力队的隐蔽配置，战斗发起的动作，便衣观察员、步哨员遭遇敌人搜索队的应付方法，演习了一遍又一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平时多流

汗，战时少流血”。矫捷的身影，灵敏的动作，冲杀的威猛，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军胜券稳操。

一月七日夜。寒星闪烁，北风刺骨。我参战部队离开范县龙王庄集结地，象离弦的飞箭，向伏击地区射去。人皆缄口，马尽衔枚。长长的队伍，悄无声息。距伏击地区十余里，队伍躲村避庄，专走僻径。狗不吠，鸡不鸣。部队进入伏击位置，观察员、步哨员早对设伏地区各村庄，实行严密封锁。一切人等，只准进，不准出。召开各种会议，对居民做好解释工作，严防走漏风声。我军便衣侦察员、观察员，杂入居民之中，担水，磨面，拾粪，以观察和应付敌人，监视坏分子的活动。整个设伏地区，“波澜不惊”，一切如常。几经战乱有了经验的穷苦百姓，喜上眉梢，乐在心头，知道八路军又要打仗了，他们拜神烧香，祈祷上苍：保佑八路军打个大胜仗！

一月七日二十四时，教三旅特务营对侯集敌人据点佯攻开始。“嘶、嘶、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夜空。霎时，冲锋号“嘀嘀答

答”响彻云霄。与此同时，枪声大作，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据点里的鬼子、伪军被突如其来、暴风雨般的枪声从睡梦中惊醒，睡眼惺松，惊恐万状，穿衣提鞋，摸枪还击。震耳欲聋的冲击号，飞蝗般射来的枪弹，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使敌人懵头转向，不知八路军有多少。一边顽抗还击，一边向城里鬼子打电话求援。侯集据点电话机前，蜡黄的脸，狼狈不堪；求援声，声嘶力竭。城里日寇兵营，微颤的手死死捏住电话耳机，狼嚎般的嗓音震得听筒嗡嗡作响。

我军电话兵早把电话线搭在敌人电话线上，沉着镇静，洗耳“恭听”，恨不得把敌人通话的每个字句都铭刻脑海。“侯集被围！侯集告急！八路军不计其数，进攻猛烈。弹药缺乏，火速增援！”侯集据点传来的告急声。

“坚决守住！坚持到明天上午十二点。皇军一个中队，友军一个大队，大炮一门，汽车四辆，弹药足够。如若有失，杀头的有！”城里鬼子杀猪般的嗓音。可靠的情报，马上传到杨勇司令员的耳中。围攻侯集据点的枪声更加激

烈，冲锋号更加响亮。据点的敌人更加慌乱，电话铃响得更急。

八日，梁家庄至碱场店一带，与往日一样，异常寂静，空气象凝滞了一样。这里虽非山林草地，却是藏龙卧虎之处。战前的寂静，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大约八点光景，乌云被朝霞融化，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太阳时隐时现。日寇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携炮一门，汽车四辆，如一群恶狼，窜出郟城县城，气势汹汹，向侯集扑来。马队在前，汽车在后，步兵尾随。公路上，烟尘滚滚，马达刺耳，马蹄嘈杂。烟尘下面，一面膏药旗白幡似地耷拉着。十一时许，滚滚烟尘飘荡在泮溪渡村前的公路上。出援的日寇、伪军，十八里地，如履针毡般行进了三个多小时。也许是疲劳已甚，也许是怕中埋伏，一声令下，敌人的车马队伍立时冻僵了似的，驻足不前，集结待命。

一小队鬼子兵荷枪实弹，东瞅西瞧，搜索前进，向碱场店而来。进村以后，穿街过巷，走家串户，到处搜索。牛棚草屋，磨道碾房，

场院草垛，所到之处，吆喝威吓，雪亮的刺刀乱插乱戳。碱场店设伏的我七团一营指战员，在当地群众的热心协助下，隐蔽严密，鬼子再三搜索，终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破绽。鬼子放心地出了村。公路上的大队鬼子，伪军继续前进了。

十三时前后，敌人主力进入碱场店村内。几个骑兵担任警戒、搜索，在街上溜了两趟，黄眼珠子乱瞅。忽然，一个鬼子的目光停在一家房顶的柴草堆上，对隐蔽其中的我部队，似有发觉，马上策马向街心的鬼子军官软大佐武田秀夫报告。狡猾的武田秀夫用手往后一指，敌人的大队马上蠕动起来，要退出村庄。这时，后尾的鬼子炮兵刚下大堤，还未进村。

老练的猎人决不会放走狡猾的狐狸，鬼子的行动逃不脱我军观察哨的敏锐眼睛。我军七团首长当机立断，果决地下达了冲击的命令。敌人的车马队还未掉过屁股，信号弹拖着蓝色的尾巴升上天空，嘹亮的冲锋号骤然响彻街头。我轻重机枪愤怒地咆哮起来，条条火舌飞向慌乱的敌人队伍。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七团

一营长温宪星率领全体战士，挥着刺刀、手榴弹，饿虎扑食般向敌人猛扑。街心的敌伪队伍如汤浇蚁穴，火燎蜂房，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武田秀夫一手紧抓马缰，一手怒挥战刀，瞪着通红的眼睛，狂喊乱叫，妄图组织抵抗。无奈，部下早已溃不成军，一边打枪还击，一边纷纷向村东野地溃逃。

越过碱场店的敌伪先头部队，听到激烈的枪声，象惊枪的兔子，掉头向碱场店退逃。隐伏在梁家庄、郭家垓一带的我七团二营，立即跟踪猛追，咬住不放。七团三营，这时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动作，插向碱场店村东之敌侧翼。敌伪更加溃乱。经过激烈战斗，在短促时间内，敌之大部被我击毙。残敌三十余人，仓惶鼠窜，妄图占据樊家楼西侧大堤，企图作困兽之斗。我七团一、三营分别以迂迴包围动作，奋勇向敌冲杀，展开围歼战，战至十七时许，终被我军全部歼灭。

当伏击战打响之时，碱场店南侧的敌人炮兵，将一门一米半高的九二式步兵炮卸下骡马，仓促向我射击。“咚——咣！”的炮弹爆

炸声震耳欲聋。我七团二营部队迅速向敌猛扑。喊杀声震荡四野。敌人炮兵胡乱打了几炮，惶惶沿公路向泮溪渡狼奔豚突。我部队穷追不舍，追至泮溪渡村北侧，敌人炮兵及少数步兵在我二营七连迅猛冲击下，全部被歼。

在伏击战激烈进行的时候，隐蔽集结在贾家楼的教三旅骑兵连，及隐伏在杨家庙一带的鲁西军区二分区武装部队、郟北县大队，严密监视郟城及肖皮口、任祥屯据点的敌人。英勇驰进泮溪渡南侧，两面夹击，击退了两次郟城城内日军一个中队的增援之敌，保障了主力部队的顺利歼敌，截获企图越野脱逃的汽车一辆，毙敌二十余人。

杨勇司令员用兵如神。增援侯集据点的日伪敌兵，全部报销。预定战斗方案，完满实施。撤退的红色信号弹升上蓝天。漂亮的泮溪渡伏击战，宣告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官软大佐武田秀夫等九人，内有关东观察员一名。士兵一百五十人，伪军官三名，伪士兵百余人，俘虏伪军三十余人，焚毁汽车四辆，缴获步兵炮一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六

挺、步马枪一百九十余支，鋼盔百余个，呢子大衣百余件，子弹及西药一批。

泮溪渡伏击战，沉重打击了盘据在郟城一带气焰万丈的日伪敌人，使敌人如断臂折股，元气大伤。吃尽日伪敌人苦头的郟城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好似看到了冲破云层的霞光，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争相传唱。歌谣唱道：

正月里，正月正，
遍地麦苗青又青，
泮渡一仗打得好呀，
八路军个个是天兵。
用兵如神是杨勇，
黄河岸畔留美名，留美名！

一九七九年搜集资料

一九八一年八月整理

整理者小记：泮渡伏击战距今四十年，当时的指挥员遍布祖国四面八方，多已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笔者未能一一采访，加之水平有限，可能挂一漏万，謬误在所难免，恳求批评指正。此文资料的搜集，曾得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鼎烈同志、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及王允平、徐雷健、牛洪涛、樊申、樊瑞卿、杨克明等领导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抗日将领罗明星

侯宪起

罗明星（1897—1939）字英三，关外（指东北）人称他“三江好”，山东省郓城县罗楼（原罗家楼）人。1932年于吉林省九台县起事抗日，曾历任义勇救国军的师长、军长、司令。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后，被任命为第十九支队支队长。

罗明星幼年家贫，聪明伶俐，爱听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英雄故事，立志长大做一个这样的人。其父早逝，随母到吉林省九台落脚谋生。1915年，因生活所迫在旧军队当兵，后深感旧军队黑暗，毅然离去，回九台石岭煤矿当工人。他团结和接济苦难弟兄，并常对工友们说：“若想改变咱们的命运，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穷苦弟兄必须抱成一团，才能有力量”。不久，罗明星抓住裕东公司老板裁减工人、延长工作时间的机会，适时组织了罢工，

迫使老板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取得了罢工胜利。后来，他结识了吉林车站站长、爱国志士王文和，随王当了铁路工人。期间，大学毕业的王文和常教他学文化、练毛笔字，常讲革命道理给他听。使他更加积极参加各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工人们一道抵制日货。1930年，他离开铁路，回到九台镇，在洗澡塘当工人。

“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愿当亡国奴，于1932年夏天，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用一根铁管造了一支枪，袭击了在九文盛泉浴池洗澡的日本兵，夺了几支枪和手榴弹，到九台桦树沟举起反满抗日大旗。他对前来参加队伍的人说：“兄弟们，老少哥们！咱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这三江两岸的父老同胞，要联合起来抗日！咱们的队伍就叫‘三江好！’”同年7月，他的队伍由几百人扩大到6000人，称做“义勇救国军”。这支队伍最初活动在九台、永吉、双阳、伊通一带；后转战桦甸、磐石、安图、辉南、抚松等地，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使敌人一提起“三江好”就闻风丧胆，

惶惶不可终日。

1933年3月的一天黄昏，罗明星率部于九台的马鞍山一带拔除了吉长铁路上的道钉。当晚从伪军新京（长春）开往吉林的一列客车行至该处，受到严重颠覆而不能前进。这时，事前潜伏在每节车厢的罗部人员，突然站起，手持短枪，对着日伪军押车人员，大声喝道：

“都不准动，举起手的不杀！”随即缴下他们的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押车日军（包括两名日军少佐）被全部歼灭，中国旅客的东西却丝毫未动。

罗明星领导的抗日队伍，于1933年7月，加入了杨靖宇的抗日部队，被编为第十九支队，罗任支队长。自此，罗部行动便纳入整个东北抗日部队的作战计划。

1933年8月，罗明星率部4000多人，打进九台，捣毁伪县政府，使伪县政府搬到吉林办公。日军视罗明星为心腹大患，纠集上千日伪军警联合大讨伐。其中县警察大队长杨仲东率300余名官兵，行至九台常家屯南山一带发现罗部的巡逻兵20余人，遂下令冲上去。罗部佯

装不支，向山上撤退，杨率部追出二里多路，突遭罗部左右伏击，打死伪军百余，杨仲东亦被击毙。日伪军不甘失败，又抽调自卫团700多人追剿罗部，奔波5天5夜，不但未见罗部踪影，反而被罗明星化装成带红袖头的宪兵，巧妙地在戒备森严的敌窝里将自卫团大队长孙玉卿抓获。

1933年8月24日，日军聚集3000之众，配备伪满军一个兵团，对罗部四面合围，妄图将其一举歼灭。罗军巧妙地迂回到敌包围圈之外。并乘敌疲之时，晚间以最快的速度冲至敌群，用大刀砍死9名日军，夺枪9支，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1934年秋，日伪头目们在百战不利的形势下，觉得硬的不行，就企图用酒宴并许以高官厚禄诱降。日军驻烟筒山司令部发出请帖，要宴请“三江好”。罗明星决定将计就计，以便乘机直捣敌司令部。经周密部署，带护卫4名，气昂昂走进敌司令部。在酒席桌上，日军头目田野一边假献殷勤敬酒，一边哇啦哇啦地说：“罗，今天请你来，别的干活的没有，就

是让你投降！只要你投降，为皇军干事，官，大大地给，条件的，你地说”。罗明星严词正告敌人：“要说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们的军队全部撤出我们中国！”话音刚落，他双枪并举，和护卫战士同时开枪，打死田野等数人，并炸毁了敌人的火药库。等日军弄清怎么回事时，罗已撤走。这就是有名的烟筒山奇袭战，连东京的电台也以震惊的语气广播了这条消息。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集中大量兵力于桦甸的太平山，同罗明星部进行了正面交锋。敌人从长春、吉林和辉南等地，调去精锐的步兵和马队。恶仗打了大半日，终因寡不敌众，罗明星的队伍被打散。他带领几个警卫员潜往黑龙江省克山县，以卖烧鸡为掩护，继续组织抗日。这期间，日军悬赏5000元伪币捉拿罗明星。1938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罗明星被捕。

日本侵略者决心利用杀害罗明星的机会大造舆论，杀一儆百。于是，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他们把罗明星拉出来游街示众。罗明星站

在寒风凛冽的车上，大声喊道：“乡亲们！父老们！别难过，我死了，反满抗日不会停止，日本必败，满州国必亡！”罗明星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吓得敌人没敢拉他游完街，就匆匆忙忙地把罗明星杀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根据罗明星反满抗日的斗争史实，于1983年11月3日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孙厚甫对鲁西的影响

許贯中

孙厚甫原名孙承志，1906年生于云南昭通城一个小职员家庭。因经济困难，由中学考入高等师范，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学习，1928年毕业。

他在中央大学与陶行知、舒新城教授经常接触，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毕业后，他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心献身于祖国。

1930年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的主编，与舒新城合著“中华民国之教育”一书。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我国。他痛感民族的危机，苦心探求救国的道路。当听到梁漱溟先生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实行“政教合一”，学生毕业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借以增强救国力量时，他甚感兴趣，毅然到山东菏泽乡村师范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感到教育救国的思想已可实现。当年12月他到久已向往的延安参观学习，并在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回到鲁西，开展抗日民运工作。随着乡村建设研究院积极分子高赞非、宋乐颜、裴雪峰等到达黄安重华学院，创办鲁西救亡工作团，设立训练班，组织武装，并出《鲁西吼声》专刊，帮助“窝窝队”训练，输送青年参加革命。还到南宫谒见徐向前、宋任穷，联系115师，找到了靠山。

1939年春，东进支队杨勇、苏振华到达鲁西。根据当时形势和孙厚甫在当地的影响，党派他担任郟东办事处主任，开展统战工作。当年年底，成立了鲁西军区，他任军区教导大队教育长。

1940年6月，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由晋东南迁至山东。他任抗大分校（冀鲁豫军区分校）教育处长。这时，他还是一个非党同志。但他却严格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早已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事业。

1941年，在军区首长杨勇、苏振华等同志

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工作仍是积极如往。

1942年9月，在日本侵略军对鲁西进行残酷的扫荡中，他英勇就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后，军区作了决定，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孙厚甫同志所走的道路，就是从一个知识分子主张教育救国，而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

抗日从军生活片断

郑和甫

1938年10月，我在郟城县中教书，当时济宁已淪陷，人们纷纷传说日寇不久就要攻打郟城。风声越传越紧，校长李春雷召集全校教职员，讨论放学问题。大家认为，为了保证学生安全，提早放学为妥，免得兵临城下，措手不及。全校师生怀着忧郁留恋的心情，不得已离开学校。

当时多数人抱着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我想总不能等待当亡国奴，必须寻找抗日的组织参加抗日。同时又想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心情更为激动。正在这时候，听说中央政治大队已到郟城，驻在城北潘溪渡。我步行到潘溪渡謁见大队长，方知大队长秦亦文是我在菏泽上高中时的老师。见面后说明来意，他表示非常欢迎。他知我是本地人，便派我负责联络地方工作。政治大队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派到敌人后方，发动

组织群众起来抗日的政治工作队伍。全大队共有五个支队，只有第五支队有武器，其余四个支队全是徒手政工人员。因武器少战斗力不强，所以不能与敌人硬拼作战。因潘溪渡距鄆城县城较近，怕受敌威胁，又移驻城西北刘口。

最初派我在经理室任服务员，干些事务工作。经理室主任郎毅卿，河南人；会计韩次珊，山东新泰人，与大队长秦亦文是同乡。韩精明能干，能说会道。曾提议创办抗日救国十人团，逐渐扩大组织，拟先从刘口作起，我十分同意，便召集刘口青年数人商议发起，后因移驻鄆城红船，离开刘口，因而停止。

政治大队在刘口时，我曾介绍本县青年晁秀宪、张玉行等十余人参加大队新成立的预备队和警卫队，为抗日队伍充实人员。11月间，大队移驻鄆城县红船，我被分派到秘书室工作。秘书主任韩晓堂是大队长秦亦文的同乡、同学，为人忠厚和气，但缺少才干。我的工作是在编“政治通讯”。政治大队由后方进入山东后，将四个队分配到鲁西、鲁东、鲁南、鲁北各地

去工作，“政治通讯”负责联系四个支队的工作。我每月还编写油印出版的新闻小报，由电讯队供稿。同时还与警卫班上政治文化课。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精神却十分愉快，觉得这就是抗日工作，忙碌是应该的。12月底大队又移驻郟城，我的工作没有变动。这一时期大队长因筹餉问题，需要去鲁南与山东省政府接洽商谈。大队长走后，由秘书主任韩晓堂代行大队长职务。这时大队所属宣传队又扩充招收宣传队员男女各十余人。每天化装排演抗日节目向群众作宣传，甚得群众称赞，取得良好效果。

此时，郟城县城已沦陷，日寇为了推行政令，怕人民反抗，在城四乡、设立许多据点，修筑碉堡，派汉奸驻守，潘溪渡亦设了据点。为了打击敌人气焰，长人民抗日志气，大队派第五支队长陈登五带领队伍，夜袭潘溪渡据点，城内敌人大为恐慌。这是日寇占据郟城后，第一次受到抗日队伍的打击，大大增长了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

1939年2月，收到大队长自鲁南来电，令大队向鲁南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转移。于是大

队布署，除留鲁西一部分队员外，其余全部出发。自鄆城向北行，过黄河滩（黄河已改道入淮），至范县，转东向寿张，过东阿、东平、莱芜，从大汶口穿越铁道线，直下鲁南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沿途经过六个县境，行程约八百里，时间二十多天。在这八百里行程中，经过敌占区时都是夜行昼宿，开始尝到夜行军的滋味，其初还有精力跟随队伍前进，到下半夜疲睏眼涩，便闭上眼睛，机器人似的跟着队伍走，前边的人一停步，后边的人便碰到前边人的脊背。军队的纪律是夜行军不许说话，不许照明，掉队自己负责，设法追赶。越过铁道线时更为紧张，跑步行进，八里内不准休息。有的人跑丢了东西也顾不得拾，直跑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女队员更是疲惫不堪。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为了抗日救国，不怕任何苦难。

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行军，终于到达了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大队在沂水县北境的一个名叫水北的小山村停留下来。大队的各部分驻在附近几个小村。往东南行二十里，便是山

东省政府所在地东里店，周围各村驻扎着各个抗日机关和部队。

四月间，大队为了联络各个抗日团体，特组织一个访问团，出发访问各处。由大队长指定王伯平任团长，刘绶之、闫惠普和我任团员，率领宣传队出发访问。第一处是朱围五一军指挥部，军长牟中珩接见了我们。这位军长系山东黄县人，为人直率口吃，谈话中间问我们的籍贯，知道都是山东人，显得非常亲热。接着，便去王庄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总指挥张经武接见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匡亚民等人。接见十分客气，但谈话时有些拘谨，显得不够自然。

岸堤是我们访问的第三处，是山东省第三行政专署所在地。我们到了专署，由专员张里元接见。张专员朴素诚恳，谈话亲切。民兵训练，是他的突出表现。

我们又到高湖，是苏鲁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于学忠接见了我们，于司令约五十多岁，身材不高，面容慈祥，平易近人，衣着朴素，谈话诚恳。据说，他很接近群众，从不

摆官架子。总司令部驻在高湖，听说还有个笑话。于总司令带兵来到此地后，问当地人，村子叫什么名字？村人告诉他叫高湖，总司令笑了，他说我姓于（与鱼同音）就驻在高湖罢，鱼得水不很好吗？

垛庄是山东省政府鲁南办事处，由教育厅秘书刘道元任办事处主任。刘与我系六中同学老友，他留我在教育厅工作，说这对于我更适宜，我也觉得自己是教员出身，于教育工作较合适，但我的任务尚未完成，不便应允。

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处是马站村，是山东抗日第八支队的驻地。支队长马保三接见了我们，马支队长约六十多岁，留着长胡须，身材高大，为人豪爽健谈，系东北义勇军出身。他所率领的部队系寿光县地方武装。政治部主任朱春和，寿光县人，为济南乡师同学，见面后特别热情。

经过二十多天，我们共访问了六处，完成了任务。我们每到一处，首先说明我们是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来看望和慰问战地各个部队的长官及士兵，了解各部队情况，随时向

中央反映。也说明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各个部队，宣传发动群众，搞好抗日工作。宣传队随着我们，化装演出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深受各处部队及群众的欢迎。

回到驻防地水北，我们向大队长汇报了工作情况，大队长感到十分高兴，访问团就此结束。大队长委任我为少校秘书兼战地记者。接着就派我参加山东省政府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到临朐县蒋峪去慰问新四师，并视察战地情况。由于半月前，胶东的日寇出发扫荡临朐县，企图进犯我鲁南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师奋勇击退。因此山东省政府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进行慰问。大队派阎惠普、郭健军医生和我三人参加。先在黄家安口集合，由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刘民生率领全体三十人出发，携带药品、食物等，直奔稷陵关。它位于临朐与沂水交界处，有大关、小关形势险要，真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之势。这在古代没有飞机大炮的时候，的确是险要可守。出稷陵关北行十余里，便是蒋峪战地，只见房屋倒塌，人烟稀少，到处是弹痕累累，荒凉凄惨，令人目不忍睹。回来后我写

了一篇“蒋峪视察记”，反映了日寇的残暴罪行，登在内部《政治通讯》及当时的山东报纸上。

六月初，日寇开始集合大批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大包围，逐渐缩小范围圈，逐个击破我抗日部队。我抗日部队分驻各处，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统一指挥，而是各自行动，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成了一盘散沙。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炮声越来越近。大队武装队员只有一个支队，四百多人，又没大炮，不能进攻，只有转移避开敌人，准备再回鲁西。白天敌人飞机侦察，不便行军，只有等待夜晚。这天夜间正在急行军，忽然下起大雨，山路高低不平，沟崖险峻难行，有的队员滑到沟里，便掉队落伍。一夜行军，困难重重，好不容易等到天色发亮，来到一个小山村，村子在山的北面，进村后没看到一个人影，各个院落空荡荡的没有中用的东西。我们都很纳闷，这村里人，是躲避敌人？还是躲避我们？只得各自找房子暂作休息。这时警卫班已布上岗哨，以为这时候不会有敌人袭击，大家就安下心，脱去湿衣服，就地找个席片坐下或躺下休息。谁知

还没半个小时，就听到步枪声和机枪声，响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大家感到不好，马上准备行动，有枪的都持枪跑出院子去抵抗，没有枪的各自寻找武器，准备最后死拼。这时我在山坡下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敌人从东南方向进攻，用机枪封住院门，已不能从东面出走。这时我手持木棍由北屋向西屋急速转移，寻找突围的出路。找不到出路，为了暂避一时，由外间转向内间。这是靠南的一个内间，东墙有个木棍小窗户，射进来一道光线，显得东南屋角特别黑暗。我就躲在这个黑暗角落里，等着和敌人死拼，谁知此处早已躲藏着一个人，于是我们两人挤在一起，谁也不说话。这时已听见鬼子进入小院，哇啦哇啦地说话，他们到北屋和西屋找人，见没有动静，还不放心，又朝两屋各放几枪，然后离去。随后又来一帮鬼子乱翻东西，这时候，我精神极为紧张，认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于是全神贯注，紧握木棍，等待拼死搏斗。在这面临危急的时刻，心情反倒平静下来，心中又燃起生的希望，忽然感觉我不能死去，我一定

不会死。因为我这一生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办，我才三十多岁，我的生命，怎能就此结束！一群鬼子走了，又来一群，我等着，耐心等着。最后一批鬼子居然放起火来，先从外间烧起，这时我的同伴难友就想跑出去，我听见院子里还有鬼子的声音，就让他再等一等。火势越烧越猛，已经从外间烧到里间，从房顶上不断落下火条子，再不出去，就有烧死的危险。于是我用左手护头，用右手猛击窗棂，想破窗跳出，怎耐木棂坚固得很，不得已从外间屋熊熊火堆中跳出，幸而未伤下肢，仅左手及头部被火烧伤。我出来后，我的同伴难友也随后跳出，他的脚腿被火烧伤两处。他出来后与我下跪磕头，说我的命大救护了他。原来他是与大队挑东西的民夫，是本地人，离这里不远。我问他这是什么村庄？他指着南面山上竖着象人样的石头，说这村叫石人坡，属蒙阴县。我环顾四周战场已无动静，日寇远去。政治大队在村外伤亡惨重，已溃散离去。村内街上，尽是丢的东西，我找了一瓶牙膏，用来涂抹烧伤。此时心恨日寇残暴，叹惜

大队惨败，心情异常复杂。我感觉无处安身，幸亏同伴难友相邀结伴同行，返回他的村庄，住在他家养伤。他问我在大队干什么，我说当写字先生，于是他便以先生哥相称。先生是对我的尊称，哥表示亲近，因此全村人都称我为先生哥。我的难友的名字叫张华泰，他弟弟叫华新。华泰的母亲非常善良，待我和亲人一样。每逢来了客人没什么好吃的待客，总是吃面条撒上芝麻盐端给客人。华泰的母亲也给我端一碗。每逢听到鬼子汉奸要到村里来，华新总是及早领我跑到山上去躲避。总之他一家人对我非常好，关心我的安危和衣食，使我心中非常感激，心想将来有机会一定报答他们。

我在这里养伤半个月，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两个人，问村民这里有没有从队伍下来受伤的人。村人不敢告诉他们，他们一再说明不是坏人。我隔着墙头往外一望，见是大队的警卫战士，同时他们也看见了我。相见后彼此说明了情况，倍觉亲切。他们告诉我，大队在石人坡被日寇击败后，队员四散逃避，找不到大队领导。听说大队长已化装潜逃，无人收集残

部，大伙无所归宿。我们三人商量，认为在鲁南已无法落脚，只有回鲁西家乡。于是我们三人结伴回家，盘费用完了，就向村人讨饭。走大道怕碰上鬼子汉奸，也不问路程远近，就走小道。我的近视眼镜在石人坡惊慌忙乱中丢失了，走路时望不远，我的同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在当中，相距四五十步远，发现情况，打个招呼，及时躲避。好在这时已是青纱帐起，便于躲避。我们白天走路，黑夜露宿或住小庙过夜。就这样我们离开鲁南山区慢慢向西走。一天下午，我们来到铁路附近的崔庄村，准备住宿一夜，第二早晨越过铁道再往西行。问村人找借宿的地方时，一位老人说你们想住宿，必须向崔区长报告，不然夜里被查岗人发现，要送到鬼子炮楼上去。我们三人商议见汉奸区长不合适，他会找我们的麻烦，不去又没办法。我认为还是去见汉奸区长，他不会把我们怎样，因为我们既没携带武器，又没钱财，与他又没仇恨。于是我们便走向村西头区部，原来区部是一座破庙。门岗两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崔区长的朋友，来看望区长的。

门岗那人回去向区长报告，不大会一个面目烟黄、年龄五十多岁的人走出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小买卖的，他说不像，你们八成是从队伍下来的。我说不管怎样，我们走到这里，听说崔区长是朋友，所以特来看望你。他见我说话客气，便和气地说，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都是中国人，过路此处，我都招待。问我们吃过晚饭没有？我说还没有。他就告诉区丁往村中派饭。并说你们今晚就住在区部里。有人问，就说是区长的客人，保险没有事。交代后，他就回家去了，接着区丁都走了。天黄昏时一个区丁送来饭菜及面汤。我们饱餐了一顿，便拿了领席在庙西边沙河底乘凉，与群众一块露宿。第二天天刚亮，我们起身时，夜里找好的向导，把我们送过铁道。我将仅有的两块钱送给他，作为酬谢。路过东平县境，天已过午，饥渴交迫，在一村里见一人正在吃饭，面前放着一碗水。我走过去就说行路人口渴，找碗水喝。此人看了我一眼，马上端给一碗水，同时他问了吧？随送给一个窝窝头，这时也顾不得谦让，接过来便大口小口吃下

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路人对我的温暖。我的两个伙伴，也分别到住家去讨饭。心想回到家中遇行路人找饭时，一定好好招待。再往西行至郛城境，渐觉心情舒畅。至城北程屯，友人杨子明在此任区长，我到区部休息一夜，次日上午抵我村。叔父在村东见我，不敢相认，因当时我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破单衣，手持木棍，形同乞丐。回到家中，一家人皆惊喜流泪，如在梦中。家人听说鲁南敌人大扫荡，我生死不得确信，日夜悬念，一旦相见，真是悲喜交集，欢喜异常！

我的两个伙伴，一姓吴，家住红船；一姓赵，家住王集。他们在我家停一宿，于次日各自回家。至此，10个月的抗日从军生活结束了，这在我的生命长河中，虽为时甚短，但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特赋诗一首记之：

为御日寇救众生，弃散入伍从军行。
抗日游击鲁南城，大雨倾盆夜朦朦。
遭遇敌人炮火猛，抵御无力势溃崩。
报国有志时不济，虎口余生无寸功。

郑和甫 1989年10月20脱稿

投笔从戎的八年

于长茂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华侵略军在北平南郊芦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个日本兵失踪，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七七事变”。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我驻宛平县29军37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侵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军。在这一伟大号召下，为了保家卫国，挽救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我就毅然离开了寿张县黑虎乡农学校，参加当时菏泽专区组织的鲁西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充任连长，在菏泽城东孔楼一带发动群众，组织队伍，积极训练，准备在鲁西南各地抵抗日本侵略军，保卫家乡。当时菏泽专区组织三个游击支队：第一支队在菏

泽，支队长孙则让；第二支队在单县，支队长是谁现在忘记姓名；第三支队在郟城县黄安，支队长曾琪（郟城县人）。

1937年底，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保存个人实力，不抵抗日本侵略军，放弃山东领土，把他第三路军的七个整编师，全部带到河南地区。同时又从菏泽专区第一游击支队和第二游击支队各抽调一个团，加上菏泽县、单县两个县的保安大队共四千多人编成第三路军补充第二旅，由孙则让任旅长，一同带到河南鄆陵、扶沟一带驻防。我连被调到河南后，我心里忐忑不安，心想：我们是山东的子弟兵，应当在山东抵抗日本侵略军，保卫家乡。现在离开山东违背了我参加游击队的愿望，在内心里决定离开这个部队。当时还想，光有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决心，而没有军事技术也不行，于是1938年5月，我就离开了补充第二旅到湖南军事学校学习。适逢湖南湘潭国民党步兵学校招收战车防御炮训练班学员，我就报名参加战车防御炮训练班学习。由于1937年8月20日，中苏两国政府已签订了互不

侵犯条约。在抗战初期，苏联政府便积极派遣军事顾问团，援助我们武器、弹药和一些军用物资。我在战车防御炮训练班学习时，军事教官是苏联派遣的，武器是苏联援助的。“三七”战车防御炮，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种武器，这种火炮主要对付敌人的装甲车和坦克车，炮弹有破甲弹（破甲弹穿射敌军车辆后才炸爆）、榴弹（榴弹的被弹面直径为30米）两种。学习期间，苏联教官对战车防御炮的射击技术要求非常严格。在训练中，他们一丝不苟，谆谆教诲，亲身示范。时值盛夏，每次训练后，他们都是汗流浹背，他们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使我们全班学员深受感动。所以学习起来大家都能主动钻研，刻苦操练，结业时都能掌握“三七”战车防御炮的性能，构造原理和射击技术。

孙则让带到河南的补充第二旅，以后开到湖南衡阳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独立32旅，旅长为樊应魁，他是国民党陆大毕业，郓城县仁怀庄人。因为独立32旅的士兵皆为山东的子弟兵，因此国民党政府起用樊应魁是颇有用心的。孙

则让被任命为湖南衡阳专区专员。

1938年8月，训练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党炮兵五十四团二营七连任排长，团长为张权少校（河北省武强县人），连长张连枝也是武强人，黄埔军校第十期炮科毕业。这个团在当时是中国军队里第一个“三七”战车防御炮团。该团成立后即在湖南省湘潭接收新兵，进行步兵基本训练。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运输线是由苏联的阿拉木图到新疆的乌鲁木齐，经哈密沿甘肃河西走廊到陕西宝鸡，才换火车装运（当时陇海线只通到宝鸡）。同年8月，我奉命率领一排士兵到长沙领炮，在长沙期间敌机每天飞临长沙上空，一面狂轰滥炸，一面低空扫射，我率领全排士兵躲避在粮行麻袋的夹缝中才幸免于难。敌机去后我率领全排士兵到长沙街上帮助军民处理善后，看到长沙街头残垣断壁弹痕累累，尸体狼藉血肉横飞，悲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激起全市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抵抗日本侵略军，保卫中国领土的决心。

1938年9月初，我连奉命自湘潭开赴河南驻马店、信阳两地接收武器弹药和骡马挽具及

被服装备，迨全连武器、骡马輓具装备齐全后，即奉命归第五战区司令部指挥，长官为李宗仁。第五战区自台儿庄会战胜利后，李宗仁即率领第五战区司令部人员经安徽的阜阳三河尖入河南省潢川暂住，我连即到潢川第五战区司令部报到。原来日本侵略军攻陷徐州后，即乘胜大举西侵，敌人的战略计划在于速战速决。企图向西南席卷皖豫产粮区，同时掌握津浦、平汉两条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逼我作城下之盟。因此，敌人于1938年6月5日攻陷开封后继续前进。6月9日我军决黄河花园口的河堤，黄河东南地区顿成泽国，敌人的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军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人改变进攻方向，出奇兵两路由大别山的山麓平原西进，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企图于截断平汉铁路后，再南下攻武胜关及平静关，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后直捣商城，再南向威胁麻城与鄂东之敌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的态势。武汉保卫战由于最高统帅部指挥失当，各路抗日部队又不能互相协同

作战，因此武汉保卫战我军节节失利，我连随第五战区司令部由渍川到商城、麻城构筑防御阵地警戒线。1938年10月12日，北线敌军已逼近信阳，另一路敌军已向麻城进攻，我连随战区司令部由麻城向黄坡的宋埠转移，在转移中，敌机尾随部队低空轰炸、扫射。幸我连伪装及时，没有伤亡。在花园车站过平汉路以西向安陆转移，第五战区司令部刚刚离开花园车站以西陈村两小时后，敌军骑兵千余人就包围了村。

1939年底，我连奉命归西北军。池凤城师长指挥开赴河南邓县北二十里处整训。我连自建连后终日随第五战区司令部行动，至此才有短期整训的机会。由于全面抗战，物资条件较差，抗战官兵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每人菜金只有几分钱，经常吃发霉的大米，发八成薪。连内士兵大多数为四川和湖南的壮丁，他们常说“一星期不打牙祭（改善生活吃肉）肠子干”。他们还有偷空赌钱的陋习，因此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军纪教育。在春节前夕，弹药排有一士兵偷卖了20发步枪子弹，被连长

发觉后未经报请上级批准（团部、营部都在湖南湘潭）就把这一名士兵枪毙了，这件事实在是张连长刚愎自用，有点太冷酷了。应当从正面进行教育，不应当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处决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无知士兵。

1939年初，我连奉命开赴河南荥阳县邙山头对岸防守黄河。这时我的思想有些波动，战车防御炮连队整天跟着军部师部行动，不能亲临第一线和敌人作战，思想上很苦闷。适从报纸上看到梁漱溟先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身份赴山东敌后视察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住在洛阳旅社，我借追逃兵的机会到洛阳找他，当时我有两个打算，第一请他写介绍信到延安抗大学习，第二随他回山东老家打游击。我到洛阳后他两天前已起身去山东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荥阳防地。

1939年夏，为训练新兵的需要，团部调我到西安东郊一营二连充任连副，我接到命令到西安后，心里还想到延安抗大学习。在没到二连报到前，我曾两次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学习，接待人员以我没有介绍信不予收

留。我在西安街头徘徊了两天，最后决心只身徒步去延安，走了两天被国民党纠察队阻止，不得不回西安。去延安不成，只好到二连报到。在二连训练士兵期间，也抽星期天到西粮城内开元寺、碑林去参观，有时也到城南大雁塔和王曲、王宝剑旧居看看。同年8月，我连奉命开赴韩城归九十军李文军长指挥。在我连开拔通过西安大街到火车站时，我们刚刚自东门进入南北大街，敌机十余架飞临西安上空疯狂地投弹轰炸，并低空用机枪扫射。我们刚把炮车脱架和骡马伪装起来，敌人最后一颗炸弹落到弹药车附近。我正在伪装弹药车，如果炸弹落到弹药车上，则后果不堪设想。敌机去后，我们迅速通过市区进入火车站。火车连夜把部队送到渭南车站，我连由渭南经大荔、澄县、郃阳各县至韩城九十军军部报到。在韩城城南夏阳府暂住，从渭南至韩城沿途均属黄土高原，居民饮水十分困难，各村群众都挖水窖，夏秋之际积存雨水以备食用，有的居民用牲畜到十里外的村庄拉水。当时群众宁愿供给你一顿饭，也不愿给你一碗水喝，因此行军时

人畜用水十分困难，我连在夏阳府整训一段时间，即开赴黄河西岸下峪口和山西省的禹门口对岸，构筑炮兵阵地，以防备敌人偷渡黄河。禹门口是黄河河身最窄的地方，仅有三十多米宽，相传是古代禹王疏九河在此处凿通的黄河河道，故称禹王口，附近建有禹王庙。黄河自河南邙山头以上两岸皆为高山和黄土高原，黄河不能滥泛成灾，黄河决口多在邙山头以下至入海处。在防守黄河期间，除严格训练士兵射击技术和加强防守阵地外，有时我也抽空到城南瞻仰白乐天祠和到芝川访问司马迁故里。韩城城垣最小，但城内建设却颇具规模。韩城在西周时为韩国。平王东迁以后，为晋所灭。现在改为韩城市，自西安有火车直达韩城。防守期间我有时赴西安购买军用品，抽空同军医人员登华山五峰，看到壮丽的华山，不禁想起中国的大片领土和大好河山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下，身为军人不能报仇雪耻，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领土，实为军人的奇耻大辱。我们战车防御炮连在禹门对岸防守黄河的同时，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带领一个榴弹炮连，在山西省

风陵渡对岸潼关一带防守黄河，另外配备一个步兵连保卫他。

1941年，因国民党为了抗战的需要，又成立了炮兵五十六团，团长为朱式勤，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和日军土肥原是同学，全团武器也是“三七”战车防御炮。为了便于训练新兵，上级又调我到陕西凤翔充任炮兵五十六团三营九连长，连队在凤翔城北柳林铺一带整训（据说柳林铺是刘伶醉酒的地方）。在柳林铺整训三个月，全团于1941年5月移驻陇海铁路南虢镇驻防，虢镇交通方便，市面繁荣，是西周时期的虢国，又名西虢，虢仲封于此。在虢镇练兵期间，全团举行实弹射击比赛，我连射击成绩为全团第一名，受到名誉奖和物质奖，全连官兵士气旺盛。

1942年夏，我连奉命调拨驻在河南省光化县老河口的炮兵五十七团三营建制，团长为陈文剑，营长为蒋北麟。六月初，我率全连自虢镇乘火车到西安车站下车，由霸桥经蓝田、商城、龙驹寨（现改为丹凤县）、商南、西峡口、紫荆关，转河南淅川、邓县、光化县、老河口南

朱家楼防地（第五战区司令部在老河口，司令仍为李宗仁），当时敌机经常出动轰炸后方。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们在行军时每天下午出发，至午夜宿营，每天行路八九十里。在行军途中，到篮田至西峡口一带全是峡谷，地形非常险要，军事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当时想起崇祯末李自成率领义军进攻开封失败后，退居商城、龙驹寨、商南一带招集旧部生聚教养，坚决推翻明朝的统治，这种斗争精神为后人所称颂。

1942年秋，我连奉命派梅排长带领士兵一班运送“三七”战车防御炮三门到襄河上游郧县修理。他们把火炮运到老河口南门外河东渡口等船过河，突然敌机六、七架飞临上空狂轰滥炸，梅排长为了保护炮车不幸壮烈牺牲，葬于老河口南郊烈士陵园，并立石纪念。我以梅排长的英勇事实教育全连士兵，练好杀敌本领，为祖国雪耻，为梅排长报仇。我平时在连队内经常和士兵闲聊天，四川人叫“摆龙门阵”。炊事班黄班长善相面术，行军途中休息时，黄班长说：“连长以后出发作战时叫梅排

长留守，不要到前方去，我看他脸上的气色不对，那时我以为是闲聊天，谁知后来竟真遭不幸。同年冬季第五战区炮兵指挥部为了加强团结，沟通声气总结作战经验。互相学习射击技术，特设炮兵干部训练班，时间一个月，我参加了学习，收获不小。

1942年11月，我连奉命配属石军团米文和军长指挥，开赴枣阳、随县一带防守敌人。自襄樊会战后，日寇损失惨重，无力进犯，故敌我双方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1943年春，我调升为炮兵五十七团三营少校副营长，奉命率领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队归五十军曹福林指挥，由老河口驻地经新野、南阳、鲁山、南召各县，在南召县的铁牛镇附近构筑炮兵阵地防守。行军途中路过南阳城西北卧龙岗，我乘士兵休息的机会曾到卧龙岗瞻仰诸葛武侯祠。时逢夜晚，我秉烛参观武侯祠，见内有卧碑20余面镶嵌在西山墙上，碑文是民族英雄岳飞书写的诸葛武侯的前后出师表。在出师表后还刻有岳飞的附识，看到不胜感慨万分。当时金兵侵略中原，人民惨遭杀害，大好

河山沦入敌手。岳飞为了驱逐异族，迎接二帝，并在自己背上墨刺“精忠报国”四个字以表示抗金决心。但是，赵构昏庸，奸臣当道，报国之志抑郁不得伸。他在后出师表附识云：

“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诸葛武侯祠遇雨，遂宿外祠，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臣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后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能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毛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这充分表现了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忠心。我当时想：目下困难当头，与岳飞所处困难时代相同，身为军人应当精诚团结，效命疆场，誓死驱逐日寇，恢复祖国的神圣领土，才不愧为炎黄子孙。

1943年冬，连队由鲁山返回老河口朱家楼驻地。旋即奉命率领连队开赴湖南南漳，归30师吉星文师长指挥。在南漳山区构筑炮兵阵地，吉星文是“七七”芦沟桥事变时首先率领全团士兵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团长，现升为30师师长。

1944年，我们又奉命开赴新野整训，四个

月后又由新野返回老河口驻地。自1941年至1944年我率领连队奔驰在鄂北的随县、枣阳、南漳、襄阳、樊城，豫西的南阳、新野、鲁山、南召，邓县，各地均属防御性质。因战车防御炮是一种特种部队，不能独立作战必须配属各步兵部队协同作战，才能发挥威力，因此没有固定防地。某一个步兵军师需要时即配属该军师协同作战。南漳、襄阳、樊城、新野、光化、邓县、南阳一带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的蜀魏战争，明末张献忠和明将两湖总督杨嗣昌在谷城附近九年的争夺战，今天又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华民族何其如此多难。

1941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鄂北豫西会战后，由于日军受到重大创伤无力进攻，第五战区各部队和日本侵略军均陷入胶着对峙状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的部队，被国民党中央当局歧视的所谓杂牌军（旧西北、东北军、直鲁军、川军）由于他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兼之指挥有方，知人善任，因此各部队将领都乐于受李宗仁指挥，如三十三集团军

司令张自忠在豫西鄂北会战时，受命担任阻击敌人之任务，他亲身督战以必死的决心拖住敌人，便于友军反攻。坚持到所属战士伤亡殆尽，张自忠以受重伤壮烈牺牲。在八年抗战中集团军司令以身殉国的只有张自忠一人，故豫西鄂北会战时各部将士都能效命疆场，英勇杀敌，使日本侵略军无力再行进犯。

1943年9月，李宗仁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刘峙，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在抗战初期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每每不战而退，故时人称其为常败将军。当他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日军广播便奚落他说：“欢迎常败将军驻老河口”。从此日寇在鄂北豫西蠢蠢欲动，刘峙到老河口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便把第五战区司令部由老河口移到襄河西岸六十里外的草店。

1945年2月，日寇陆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率领全部侵略军进犯豫西、襄樊和老河口各地。由于刘峙指挥无方，又无坚强的防御措施，对老河口的防御只派川军47军一步兵师（军长为陈鼎勋），当时我奉命率领一

个战车防御炮连队协同该师防守老河口，师指挥部仓促应战，战前没有在老河口东五里外的马鞍山构筑前沿阵地，致使日寇很快沿着邓（邓县）光（光化）公路占领了马鞍山。构筑炮兵阵地，我军只好固守老河口土寨阵地与敌战斗。敌人居高临下，我军阵地时时遭受日军的炮火威胁，我军处在不利的条件下。由于全师官兵目睹敌机残酷轰炸老河口市区的悲惨情景，激起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誓死保卫老河口的决心。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敌人曾五、六次冲入老河口东北门内，敌我进行白刃战，肉搏战，逐屋逐巷进行争夺战，几次往返冲杀，终于把敌人打退，敌人装甲车几次冲入老河口前沿阵地，均由我战车防御炮一次又一次击退。战斗到十天，敌人的炮弹炸伤我战车防御炮连第一炮长腹部，我命令他退出火线，他坚决不下火线，用左手捂着流出的肠子，继续指挥炮手射击敌军装甲车，迫敌装甲车带着火焰逃跑，他才下火线。和敌人激烈战斗坚持了十五个昼夜，敌我双方损失惨重。小东门内外敌人遗弃的尸体横七竖八，狼藉满地，臭气冲天。

战斗持续到十六天下午，我步兵师团因换防部队后撤前沿阵地，士兵不明真象，认为放弃阵地转移，阵地一乱，士兵失掉防守信心，师指挥部也一时惊慌失措，认为无法挽回士气继续战斗，随率领部队从老河口西南角退出，到襄河西岸。过襄河时船小人多，士兵争先抢渡，致使沉没了两、三只小船，我和营部士兵是乘坐最后一只小船渡到河西岸的，在谷城西北六十里处收容整训。

日本侵略军入老河口后，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敌军师团长藤田茂认为侵犯老河口受到重创，为了发泄其兽性报复，一把大火把在八年抗日战争形成的豫西鄂北战略据点老河口化为灰烬。

1945年8月14日下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奔走相告，全国欢腾。194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最高当局发布全国军队进行整编的命令，炮兵五十七团以连队为单位分配到各步兵军师建制，其余营团干部均编入军官总队，我被编入到第十四军官总队，驻在河南郾城。硝烟迷漫，战火纷飞的八年戎马生活从此

结束。

写在下面的几句话

抗战胜利已经五十周年了，青年一代对八年抗日战争的残酷斗争是陌生的，我们应当教育下一代不忘过去，不忘历史。时至今日，日本军国主义狂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回忆1946年遣送日俘时，据东北群众反映说：“日本侵略军临走时和我们当地群众握手时说：‘十年以后见’”。他们说十年以后再见的的话是意味着十年以后我们还要侵略你们；又如在检查日俘携带行李中，常常从他们的被套里搜出东北地区的详细军用地图。他们虽然投降五十多年，战争贩子还是蠢蠢欲动，如篡改教科书事件，参拜神社，光华寮事件，某国会议员篡改历史大放厥词，周总理诗碑被砸，这些事实不单纯是事件问题，而是有政治阴谋。我们要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在中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我们

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应当自尊、自强，提高警惕，不忘过去，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红枪会抗日史略

马玉斋

抗战前，全国处于混战时期，大小军阀割据，称王道霸，互相争夺，战火连起，散兵败将到处流窜，勾结当地不法分子，地痞流氓等，由少聚多、由多聚大，冒充某军，驻扎农村。向群众敛粮要钱，一时不到，就掠夺抢劫，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奋起自卫，红枪会组织即时而生。

红枪会以传教士为领导，各村设立佛堂，烧香磕头，迷信神灵保护身体，并说，可隔枪挡炮，增加战斗勇气。由于群众有封建迷信思想，易于接受，很快遍及乡里，成了群众性的组织，由传教士领导，定期集合。各村掌班的领队每人红缨枪一杆，七首一把，到集合地聚齐后，列队出发，向大集镇游行示威。有侵犯者，则进行攻打，一时威震鲁西，使残兵败

将，流窜匪寇，不敢侵犯。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入中国，奸淫妇女，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人民愤怒至极，随将矛头转向日本鬼子。在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除建立抗日自卫队，也着人将红枪会抓起来，作为自己的力量。

郟西一带红枪会以黄桥为基地，黄鸿正、黄鸿兴、刘自剑为领导人，共有会员300余名。同自卫队一样，听从区县的指导，驻郟城附近（县城也失守），防止日伪外出骚扰。日本为了扩展地盘，征粮要钱，不断纠集日伪军出发攻打自卫队和红枪会，所以城西接连有玉皇庙、吕堎堆、黄岗等战役。

有一次，红枪会百余人驻太平庄、樊庄一带。敌伪一部百余人，由汉奸陈扒皮率领，由县城向太平庄进发。据报敌人急欲到太平庄征粮要钱。他们进村后四门封锁，不准有人外出，把重机枪设在西门外高地上，对我西樊庄驻地严加警戒。

红枪会侦得敌人详情后，战斗情绪高涨，一致同意打敌伪、夺机枪、为民除害。黄鸿

正、黄鸿兴、刘自剑三人作了研究，决定：选拔奋勇队四十人由刘自剑、黄鸿兴率领分南北两路，从两侧迂回到太平庄西南、北面顺路沟接近敌人。黄鸿正率防地所有人员为预备队，预先派兵一班，进至太平庄西适当地点，隐蔽起来，向敌人射击、诱惑敌人。战斗全部打响后，黄鸿正率全部向太平庄西门进攻，突击队听到三声枪响，从南北迅速夹击，使敌人措手不及，闪电间完成任务。布置完毕，立即行动。

上午九时许，太平庄西响了几枪。敌人急忙进入阵地，捞过机枪盲目射击，一梭子弹打完后，前面枪声停止。敌人正在猜疑，村南三声枪响，突然杀声四起，各路光膀子的勇士，手端红樱枪，雄赳赳冲向敌人，鬼子伪军吓得拔腿就跑。鬼子命汉奸搬机枪，未走几步，被我军胡自理同志一枪刺死，另两个受伤逃命。我军三路合兵追击，敌人狼狈逃窜。战斗结束，我军刺死伪军一名，刺伤三名，获步马枪一支，重机枪一挺。

自此红枪会勇战日伪，夺取机枪的事迹传

扬乡里，鬼子感到束手无策，畏缩城内不敢外出。一面上报请求增兵攻打，一面派人侦察红枪会的详细情况。

太平庄战后二十余日，即1939年3月6日，鬼子纠合三县敌伪约四百余人，钢炮三门，重机枪一个连队，骑兵一部，步兵二百余人，由县城出动，经陈坡、红船迂回到水堡，企图进攻红枪会基地黄桥，消灭红枪会。

红枪会闻报后，同志们都十分气愤，一致表示誓死保卫家乡。当即由陈楼防地撤回，进入黄桥村。笔者率区队三十人，为了支援黄桥战役，占据五岔口，阻止日军东进，保护战地北面。

上午10时，敌人在水堡兵分三路开始进攻，骑兵一部沿堤东进，警戒堤北，西马楼村前后分兵两路，钢炮架在黄桥西南坟林内，重机枪设曹楼东头。战斗打响后，敌两门炮集中轰击西门，不大会门被炸塌，围墙推倒多处。红枪会用树枝堵上，仍坚守阵地，敌人数次冲锋均被击退。只可惜枪少弹无，杀伤力太差，使敌人十分狂妄。

战斗持续到中午12时，这时敌人又用密集炮火，将两面围墙全部摧毁。用重机枪掩护督促步兵进行冲锋，红枪会领导感到围墙全部倒塌，无法坚守，就有计划地从北面村行内逐渐撤退，安然无伤亡。

敌人进村后，放火烧房，残杀未逃出的老人数名。

以后郟城县处境逐渐恶化，敌人不断增兵扫荡，纠集汉奸安钉、设卡，抗日自卫队多数被打垮，红枪会内部发生变化，大多数随刘自剑投奔人民政府，编为独立营，下余红枪会人员自行解散。

红枪会坚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配合全县人民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红枪会英勇抗日的事迹，一直在郟西一带群众中广为流传。

清末和民国时期郟城的放帐铺

王 锡 亮

放帐铺，是旧中国的信用机构。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把这种信用机构称钱庄，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等地则称银号。我县清末和民国时期则是钱庄、银号的名称并存。群众叫这种信用机构为“放帐铺”。

我县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钱庄、银号的简略情况是这样的。

和盛银号。是清同治年间（1862—1875年）由张营高家在唐店开设的。财东是大地主，资本雄厚，聘用经理三人，店员二十多人。他们的分配方式是财东和经理吃股分红。操业几十年，不仅财东大发其财，几个经理也各置地三四百亩，资金达到数万元。与其同时期的还有郟城城内的永和堂药行兼银号。

郟城北关项记钱庄。它开业于清光绪年

间，财东是拥有三十多顷土地的经营地主李勋臣。开有春元杂货店和官方特许经营的盐店，垄断盐业市场。其钱庄设在现公安局后路西的四合院内，没有门头。此即所谓“黑字号”钱庄。

光绪末年，广裕和银号、裕生厚银号相继开业，都承办汇兑业务。

清末城内已有银号十五家之多，资本均在两三千吊以上。

民国七年，因年头荒乱，土匪蜂起，农村不得安宁，一些地主为保全其财产逃避城内，集居现在的郟城一中处，称富户街。他们为谋生财之道，有的自营或集股经商，有的单开或兼开银号。至民国十年，郟城城内商户近百，比民国初年约增倍半。此间郟城县境内的银号、钱庄多达一百六十多家，每家资本一般都在四、五千元。广裕和银号、玉立银号资金均达万元。

民国十六、七年间，有了商务会办的惠祥银号，并在城东、南、北三关分设惠东、惠南、惠北银号，同时兼出钱票，以作资本。

民国二十一年，县新商会已有商兵二十多人。当时主要负责人王仁卿、徐福涛、李相南，由商家集股成立了金融维持会，该会发行金融流通券，以此发放贷款。后来徐福涛携款八千元潜逃，金融维持会只两三年的时间，便宣告垮台。

民国二十五年，成立了代理“民生银行”放款的“郟城金融流通处”，至日寇侵占郟城时瓦解。

抗日战争之前，郟城城内还有二十多家银号、钱庄。城东徐庄的徐远征依靠他叔兄当县财科科长的职权，用公款放帐。事变后，用车子拉走了一箱子银元，约有六七千枚。三里庄的杨士臣，在东门外开宏济堂药店兼放帐。乡下开银号钱庄的不少，如武安就有同义兴、公聚成、中兴三家，每户资金约有硬币五至七千元，从业者都各有三四人。1962年，按陈坡公社范围统计，曾设过钱庄银号十六处，光五界首王楼就有同兴、德泰两个钱庄。

当时银号、钱庄是怎样达到高额利润的？大体说来，通过以下手段：

1、兑换。清末民初，钱币复杂，成色比值不一。民间交易需以整银换碎银，也有以碎银换整银的。其中的换互，均需外加百分之三，此即所谓“进出三分利”。以钱易钱或以银易钱都要索取三四十文的贴水。以纸币兑换铜元或不同种类的银元互换，都要索取若干贴水，其比数约为百分之一、二。

2、倒卖银元。当时每枚银元价值铜子两千钱。银号用铜子买银元，储存一定的银元后，即哄抬银价，对需用银元者，以两千零二十文卖给，从中渔利。

在银钞并行之时，虽有规定比价，但群众轻钞重银。银号就利用地区比价不同，倒腾钱色。如天公钱铺就从沿黄各粮行用银元以比较低的比价换买钞票，寄存济南钱庄。对我县有汇往济南买东西的，又以银元按较高价折算付款，这实际上是一种汇兑形式。这其中一般要看利五分，高于当时放款利息。其对象主要支应驻我县的客军。

3、收取汇水和占用邮汇资金。因当时汇费较高，加之延缓汇款的支付，挪作短期贷款

或移作其他营生，获取利润。

4、放债。这是银号、钱庄经营的主要方式。其条件：一是要有保人，穷人贷款更需托人担保，到期不还，保人要垫付款项；二是以房产作抵押，三屯大地主江三妮解放前拥有四千亩土地，且兼营放帐。智勇才托人借他两千元，只差五百元未还清，七年滚成三千多，因无力偿还，逃往潼关，被江三妮的大儿子抓回，智勇才被逼得悬梁自尽，保人贾修真将二亩薄地一头小牛垫了款。因此被强占财产者不少。

借款的凭据叫揭贴或契约。借款的期限有年期（一般十个月为一年）和月期。利率年息高，月息低。高息有四分的，个别也有五分的，一般是三分。利息最高的要算放牛窝子钱了。过去买牛多十天支钱，到期支不上的，便向钱庄借款。这便是牛窝子钱。一般十日为期，日息六厘。逾期不还，便折利为本，同时起息。这便是群众常说的“驴打滚”利。

再是农村放粮放款高利盘剥。邵集贫农杨其光借地主杨存元七元钱，三个月滚成五十六

元，家中的破旧家具还债不够，又借了外祖家两个袄套，才把债还清。东贾屯贫农郭清汛，借地主郭子范四十元钱，十个月滚成了一百六十元，被债主讹去家产，使其流离失所。南赵楼贫农李东山春天借地主赵尹忠一百二十斤高粱，年终滚成四百八十斤，全家人给赵家干活一年，每人只付给粮食十七斤。

还有乘荒年放债发财的。1935年因黄河决口造成庄稼失收。江三妮此时把三万斤坏高粱以吃二还五的高利放给农民。这年三屯就有一百二十九户破产渡荒，而江三妮却在这一年里坑讹农民六百多亩良田。

1942年，李垓大地主李宗真一家，放出粮食八万斤，收回十六万斤。该村十五户地富合开两个放帐铺，资本两万元，月息四分。一年里就从农民手里要去或讹去土地四千八百二十亩。其中二十户农民把土地卖光。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广裕和银号、裕丰恒钱庄，以及官办郓城金融流通处。

1. 广裕和银号。它始于光绪三十年，也称王营汇兑局。从清末民初就承办汇兑，在济

宁、济南和东北黑龙江等地都有其汇兑庄。郓城向省解缴粮款，亦由其办理汇付。它的股东都是官绅，有在山西做过县长的李体仁的儿子李仲月，有当过师长的李凤祥及梁乃荣等，经理是王营的王继尧，其资金达万元，是我县头号官商。广裕和所出乡票流通于附近各县，并远及东北。它曾同祝桥、张营、曹洼的地主和济南洪盛号合营德聚粮行，资金约两万元，聘伙计二十人，收购囤积，代客买卖，收取用金。

2、裕丰恒钱庄。它是张营乡的高怀珍（民初就有双八万之名）以六千吊钱作资本开办起来的（当时五大吊为一元）。他在张营、郓城、济宁各设钱庄一处。以张营钱庄来说，方圆九十里七十余个村庄，百分之八十的户都受其高利贷剥削。孙庄的李继孔借裕丰恒五十元，到期不能归还，本生利，利作本，钱庄逼债，典卖全部家产，还未还清债务。车市的车汉杰等四户合伙做生意，借裕丰恒一千二百吊钱，两年滚成二倍多，因受债务拖累，均家产败落。裕丰恒钱庄经营借贷数十年，得利三十三万元（银币）。

3、郓城金融流通处。它是于民国二十五年夏成立的代山东省民生银行贷款的官办金融机构，拥有流通资金两三千元。由义和里的李友松任主任兼出纳，赵念宗任帐先生，并设有通讯员、炊事员，工资由县政府拨发，但不归县政府直接领导，直接由菏泽各县金融流通处组织的“联办”领导。贷款资金由“联办”拨给，按年利率百分之十计息。县流通处将款贷给各乡信用合作社。当时各乡实际并无此组织，而由与流通处有关系的头面人物造用假花名贷用了。因年利率为百分之十二，低于当时农村借贷利息，年终收调贷款时，其获利部分流通处就作了杂支和奖金。在手续上，乡信用社向流通处贷款须有乡土学校作保。

民国二十七年，由于时局动乱，李友松携款逃跑，赵念宗看守机关一年。民国二十八年县长向赵念宗索取征取单，将所收各乡贷款中饱私囊。至此，郓城金融流通处彻底瓦解。

（根据《郓城县工商行志》整理）

万春堂药店和龚氏家族

苑仁祥

龚氏祖籍江西省南昌府新昌县龚家城村，清末迁郢城定居郭屯镇。

龚怡汉生于1859年（清咸丰8年），初为银匠工，家境贫困。1879年（清光绪4年），随父龚邵桃在风雨中漂摇，领女儿来到郭屯镇栖身暂住。次年，在该镇办起了万胜楼号银铺，专门制做银坠、银簪、银钗、耳环等首饰，平日走街串巷，逢集日设摊于银品市销售，获取薄利，聊以谋生。

郭屯张氏家族，拥有大片土地，人多势大，并有人在当地任“里长”官职（光绪年间，里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管辖20余个自然村），经营着仁和药店，是附近有名的一大家族。龚怡汉是个有智谋的人，他深知自己是外地户，举目无亲，欲站住脚，生存下来，需靠张家势力。于是，他和张家结亲通婚，认义亲。开始

经常无偿地给仁和药店干些杂活、脏活，加工炮炙，审方抓药，文武粗细，在所不辞，久之药房活计得心应手。同时，龚怡汉在帮忙中潜心学习，不耻下问，逐步增长了经营药业的才干。1885年（光绪10年），自己办起了批发兼零售的万春堂药店。

1915年，龚氏兼办起驿铺（邮政代办所），收发、送各种文件、包裹、报纸、汇款等项业务。民国年间负责四区诸村，每月县邮局按经营业务大小拨给手续费。龚怡汉是个理财能手，带领四个儿子，信多送信，药方多抓药，集日设摊售银货，三项业务，轻重缓急，处理得有条有理。龚怡汉为人诚恳谦恭，和睦乡里，与邻居相处甚善。他奉行和气生财，信誉至上的宗旨，上至官长，下至平民百姓，不欺不贬，一视同仁。门市部营业柜台，备有招待客人用的烟、茶水，夏天还备下扇子。大宗货主登门购药，酒菜招待，古道热肠，热情倍至，客户无不满意。

建国前，郭屯镇是城南贸易集散地。镇上有好多家店铺、饭馆。同时，社会上各类霸主

地痞人物活跃，常向店户勒索钱财。众人有言：“镇上做生意，三年内莫想赚钱，待关系处好，生意方能兴旺。”龚怡汉为在生存中谋求发展，也就不得不对镇上各方霸主和地痞，施以小惠给点好处，诸如邀请陪客，吃药不收钱，困难者资助，有借必应等。就是对那些极不讲理者，也取忍让态度，相安共处，免生是非。这样，才慢慢站住了脚跟。

对镇上平民百姓吃药，则给以优惠，对那些穷苦百姓，常是不收钱，龚怡汉常对人言：“天下穷人多，富人少；而财产富人多，穷人少，穷人欠的钱从富人身上找。”龚这种经商的指导思想，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父子相继，延续70余载。

龚怡汉是个有毅力的人。1930年，龚步入古稀之年，因积劳成疾，身体虚弱，眼失明，但仍坚持热情待客，坐堂门市，以往年待客商风，问寒问暖，摸市场行情，谈仁义论道德，曲尽人情，顺乎民意，与子孙谈经商生财之道。若有医生登门，聆听医生见解，指点后代扬长避短，使企业繁荣不衰。

龚怡汉卒于1935年，终年76岁。有四子，即龚谋源、龚谋乾、龚谋峇、龚谋坤。龚怡汉去世后，兄弟四人分支谋生，独立经营药业。万春堂药店、银铺、邮政由长子龚谋源负责经营；次子龚谋乾离开药业，到郟城信局从事邮政工作；三子龚谋峇于1934年前后，在郭屯镇南街开办衡生堂药店，独资经营，此人商德甚差，常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而失去信誉。他纸包烂草，著上各类药名，装璜药架，以示店内药物齐全。逢集日，专门有一人敲空套筒，叮当！叮当！虚造声势，以吸引病患者登门抓药。药价忽高忽低，很不稳定，时有趁人们之危，漫天要价，欺诈顾客。在群众中影响很坏，故此，生意萧条，不久倒闭。

四子龚谋坤，由父指派，于1930年去城东南吕月屯村，跟刘倚文学习中医妇科。龚谋坤刻苦学习医术，提高较快，不久成了著名妇科中医，超过了师傅刘倚文。1935年，在该村办起了育生堂药店，行医兼售药。1958年，龚谋坤离开郟城去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就业行医，在某商业医院任中医内科主治医师，颇有名气。

龚广太（1908—1986年），龚谋源之子。自幼生活在商业世家，家教甚严，受祖父影响较深。他聪明好学，锐意进取，先学的四书五经，后入学堂，高小毕业，成绩优异。

1935年，代父挑起经营万春堂药店、银铺、邮政的重任。这时龚广太经商之才已经成熟，购销成为内行，他为人处事恪守“忠厚共事，以和为贵”的家规。1938年，日军侵郟，占领郭屯镇。药店、银铺、邮政暂转交刘贯三代管，龚广太随父逃至汉石桥避难。1940年，其父病故。在危难中，他承受了龚家商业，龚广太富有开拓精神，谋事有方，不久增设了杂货业务，经销烟、酒、糖、茶、纸、香火等，生意兴隆，人员增至6人，有时日营业额多达250元银币。

龚广太在结交医生，开拓药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一般堂店均设坐堂先生，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妥当，他说：“医者无万能，病者无所不有，设医售药受局限。开方给医生薪水，无病人登门需养医生，费用增加，与其设医不如结交各科医生”。因此，他对周围几十

里的医生，认真搞好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龔广太勤奋能干，工作特别细心。他虽是店主，但事必躬亲，不当甩手掌柜。柜台的营业，亲自审方、计价、记账，一怕出错贻误病人，二怕价格搞错，影响本店声誉。他严把质量关，加工、炮制、进货一管到底。邮政业务的收、发、送，杂货、银货的购进，银饰品铸制、销售，他都亲自审定。有时还亲赴外埠购货，联系业务。

龔广太为人忠厚，社交广泛，办事讲信用，宽宏大量，薄财重义，有商业界“小宋江”之美称。遇有同行和其他店铺有困难时，则慷慨相助。据查考，郭屯镇上有三分之一住户曾欠过龔广太的钱款，他从没伸手讨过债，此举深得民心。

龔广胜（龔谋坤之子），生于1918年，卒1960年。幼年双目失明，但有志气，人残志坚。在父亲教育下，学习药性知识很努力，苦尽心血，专心致志，凭手摸、嘴尝、鼻闻，鉴别各种药物的优劣、真假。他深入药房，熬过

寒冬酷暑，吃尽辛、酸、苦、麻、辣，他把药味差不多的十几种药摆在一起，细心品尝，反复比较、揣摩。如苦味，许多药物具有，龚广胜则将含苦味的药分成几十种，辣苦、甜苦、香苦、凉苦等等，以轻重程度，确定品种类别，丝毫不差。由于他刻苦努力，终于掌握了鉴别药性的本领，能辨别350余种中药材。

他当采购员，药价熟记脑海，问答如流。分辨货的等级一般无差错。一次和同行共赴当归产地购药，购进的货质量高，价格便宜，为此在同行中颇受称赞。十几年曾先后到济南、济宁、亳州、安国、陕西岷县等地购货，从未出过差错。

他对饮片加工炮炙的技术，掌握比较熟练。切片厚薄均匀，炮炒火候适当。药店各项业务，除审方、抓药、记账以外，其他工作都能办得尽如人意，是育生堂药店的骨干人员。他还会修自行车、买卖东西、做饭、做简单的农活……被当地民众称为“盲圣人”。

龚氏家族，以郭屯为中心，以经营药业为主，分支繁衍生息，历经70余个春秋，风风雨雨

雨，先后在汉石桥、吕月屯、王兵马集、双集办起了广和堂、德胜公、育生堂、卫生堂药店，分布城南五个乡，是郟城建国前药业中的一大派系。为郟城县的中药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公私合营时，遂加入了国营企业。

关于政治大队的始末

郑和甫

政治大队系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的简称。大队的所有人员臂章均印有“政文”两字。政治大队于1937年来山东，到1938年夏在鲁南敌人大扫荡时溃散。这个队伍在山东仅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但在抗日初期，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说起政治大队的来源，它是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联系的。1936年山东八个师范学校本年应届毕业生集中在济宁训练，培养乡村建设骨干分子，由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梁仲华兼济宁专员负责训练。开学不久，由于时局紧张，济宁不稳定，梁仲华遂将这些学生带到河南洛河，又从洛河带到武汉交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经过短期训练后，编为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因梁仲华患病，另委派秦亦文任大队长，领少将衔，率队回山东，深入敌后，做抗

日宣传工作。大队自武汉出发时，带有小汽车一辆，大队长专用；大卡车一辆，载电讯器材及军械物资等。

政治大队的编制共分六大部分：即大队部以下又分五个支队。总计约有一千余人。大队部设有秘书室、参谋室、经理室、医务室、副官室、电讯队、宣传队、警卫队八部分。各室设主任一人，各队设队长一人，指导员一人，均为校官衔。大队所有队员均为尉官衔。第五支队为武装队，下设四个中队。每中队有轻机枪两部，队员各带步枪及手榴弹，负责保卫大队部的安全，经常随大队部活动。其他四个支队来山东后即分别赴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各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或与当地抗日组织配合工作。所有大队人员按不同级别都发给生活补贴费。大队生活费用皆出钱自己筹备，不向地方征派。

大队部进入郛城后，先驻城北潘溪渡，后移驻城西刘口。这时又招收预备队，由参谋室负责在城西赵楼训练。又招收警卫队由副官室训练。宣传队随大队部在附近各村进行化装演

戏做抗日宣传，教儿童唱抗日歌曲。秘书室以油印新闻简报张贴街头，并向群众宣传时事政策。所有这一切活动，很受群众欢迎。1937年冬，大队部由刘口移驻红船，后又移至王垌堆（现在鄆城县）。由于经费缺少，大队长秦亦文绕道赴鲁南沂蒙山区与山东省政府联络，以便取得接济。大队由秘书主任韩晓堂负责。在此期间，第五支队长陈登五于某日夜带队袭击潘溪渡伪军据点，进入院内给敌伪以沉重的打击。伪县长刘本功非常惊慌，多日不敢出城。

春节过后，接大队长秦亦文自鲁南来电，命大队转赴鲁南与山东省政府靠近驻地，以便接济。因此政治大队由鲁西转入鲁南。在鲁西仅留下参谋室和预备队。大队到达鲁南后，驻扎在沂水县水白村及附近几个村，距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二十华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想把大队全体人员归山东省府改编，取消大队番号。但是大队长秦亦文不同意沈鸿烈的办法。因此政治大队派出访问团及宣传队到鲁南各抗日军政驻地，进行访问，取得联络。如五一军军部牟中珩军长，八路军总指挥张经武司令，

苏鲁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等，都取得了联系。因此政治大队在鲁南抗日根据地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部队发生矛盾，引起摩擦。在此期间，大队还派出医疗队及政工人员配合山东省政府所组织的慰问团，赴临朐穆陵关、蒋峪等前线阵地进行慰问。

1938年夏，鲁南敌人发动大扫荡，从四面包围我抗日根据地。我方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形成各自作战，缺少联络，因此阵线散乱被敌人各个击破。政治大队，第五支队长陈登五受沈鸿烈离间，搞独立，脱离大队，因此战斗力弱；在敌人大扫荡中，政治大行军到蒙阴石人坡遭遇敌人，伤亡惨重。大队长秦亦文潜藏隐蔽，政治大队的主力由此溃散。后在鲁西又出现政治大队番号，乃大队剩余残部，不久亦归消灭。大队长秦亦文逃到四川重庆，日本投降后，他任中央特派员，到济南接收敌伪物资，办理合作社事业。济南解放前，他又逃到南京去了。

郟城“民七”之乱

李樹林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郟、鄆、巨、菏一带，发生了村村户户不得安宁的民间大乱。因为范围小，外地区多不清楚，但在上述地区影响颇大、甚广，民间统称称之为“民七之乱”。至于这次暴乱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虽经几次座谈讨论，但始终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现就我根据多次参加采访座谈的情况，记述于下，供大家参考，并望知情者多提修改意见。

1917年（民国六年）古历七月一日凌晨，张勋、康有为等头戴花翎，身穿朝服，带领遗老遗少三跪九叩，将十二岁的废帝溥仪重新拥上了皇帝宝座，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很快以失败而告终。郟城的“民七”之乱和溃散的辫子兵有直接关系。

从张勋部溃散回来的张占元是郟城县郭屯

镇人，幼年读了几年私塾，学业无成，学了一身坏习气，结交一帮恶少，在郭屯镇堪称一霸，后来投奔张勋部下当兵。由于张占元善于奉迎，颇得张勋赏识，很快由兵弁升到把总。复辟失败后，张占元便把本部余孽百余人拉回家乡，带来了百余支洋枪，又联合了青年时期的好友范秉心（绰号穷秀才）、王更烈（绰号白天祖）、史殿华（绰号二秦琼），还有乡里侠士王良五（本县王垓人）、白脸王三（也称老王爷、王楼人）、野狸子（也叫李箠子），这些人又联合了一部分乡里恶少，招兵买马，参加者大多是游手好闲的人，也有个别人因生活逼迫铤而走险的，成了乌合之众，在老僧堂拉起大旗，旗上由范秉心亲写“天下第一军，杀富济贫”，公推张占元为大帅，队伍很快扩大到万余人。

他们虽写杀富济贫，只是随便说说，并不实行，没有政治纲领，主要是吃、喝、玩、乐，开始架大户，要钱要物，后来逐村喊项，除白银外，还有白面、肉、酒、衣物、马匹等，各村必须按要的数准时送到，村长只好按户或按

地亩要齐，否则就要挨打受骂，搞得郟城一带人心惶惶。所以，郟城全县大乱，地主富农纷纷逃到城里避难。知县齐颜林，没有为民治安思想，采取了妥协态度，派使者给张占元讲条件，条件大意是：咱们都是混饭吃，四海之内皆兄弟。齐颜林不出城，张占元部也不进城，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张占元在潘渡村唱大戏，知县齐颜林还差人送去肉、酒、鞭炮、白银等物，表示祝贺。城内逃来的地主很多，居住不下，在塔附近搭了很多帐篷、席棚临时居住。

民国七年四月，张占元部从郟城城东出发计划去引马集一带要粮要钱。住在五界王楼约一千人，派人到离王楼三里的彦张庄喊项，除要白面、酒肉外，还要大闺女，因此触怒了彦张庄居民。他们团结起来，上寨墙守卫，抗拒不交所喊项目。二次喊项时，被彦张庄居民用雁打的二人抬枪打死二人，因此，攻打彦张庄，三天攻不下，临退时又一次猛攻。当攻不下计划就走时，却从村南门打开缺口，随之一拥而入，见人就杀。村民们三天的守卫疲劳过度，

丧失了战斗力，凡没逃脱的没有一人幸免，这场屠杀共死人237人，占全村人口的一半。其中死绝者5户，另有瓦屋庄王老四在彦张庄帮工也被杀死。小头目康守正闻知，马上禁止杀人，才停止了屠杀。

白脸王三，是西北王楼人，他率部到达于庙村，村民不逃者较多，见人就抓，抓了一百多人，拉到雷庄审问。凡是有钱的交四十元白银放回，没钱的打四十大棍放回。因此，他们所到之处，不分老幼男女穷富，全都逃避。

二秦琼史殿华，住在大人村楼上，命部下去阎庄喊项，因要的猪羊美酒白面一时交不齐，就派人去打阎庄，在阎庄西门外展开了战斗。虽然阎庄村民大部习武术，但史殿华部用洋枪（就是湖北造步枪、套筒子等）阎庄村民没及逃跑的，被他们抓了三十多人去当人质，带到大人阎王庙内。拿白银五十元才能赎回一人，也有因交不上白银被扣两个多月的。

这帮人用黑话交往，例如，姓杨的人叫啃草子，姓王的人叫虎头子，姓李的人叫超手子，被抓的人叫肉蛋子，称当兵的为花腰子。

吃饭称上啃，走路称开拔，他们相互之间称掌柜的。穿的杂乱无章，红绿都有，也有戴清朝的红缨帽的，也有穿灰色军装的。他们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鸟枪、土炮、大刀、长枪、钢叉，个别也有洋枪（九连登、汉阳造等）。

后来，张占元的旧交魏天德，投奔东北张作霖，当上了副官长。魏天德探家和张占元接头，意欲同投张作霖。魏天德回东北向张作霖建议收编张占元，张作霖很高兴，议定张占元把队伍拉到日照县石旧所，他再从大连派轮船来接。张占元就把本部史殿华、王更烈、范秉心、白脸王三、野狸子等头目集中到西北王楼计议。张占元说了招安于张作霖部下，其他头目都同意，只有野狸子不同意。他说：“我们不到一年时间，在这一带有一千多个村向我们纳贡，何必去受约束”。野狸子随带本部往徐州东北盍里去了，其余数千人，都随张占元东去。

西北王楼会后，大约在民国七年冬天，他们又抢了西张庄地主，不过这次抢劫，只抢地

主，不再打抢百姓。他们进庄高喊：“老少弟兄们不要惊慌，我们只抢富户，我们吃稠的，也给您点汤喝！”结果只要白银，把铜钱粮食都撒在街上，叫穷人拾去。这样，胆大的穷人略有所得，老实穷人依然贫困，这也算大旗上写的“杀富济贫”吧。

张作霖收编的信息，很快叫山东军阀张怀芝知道。他和施从宾计议，这支队伍，如果归随张作霖，奉军如虎添翼，便决定消灭他。就在东去的路上（俗称东山套即沂蒙山区）用布袋战术埋伏了人马。张占元没有任何防备，进入了包围圈，经过一场战斗，人地两生的张占元部不堪一击，张占元等头目，大都阵亡，逃跑者隐蔽在家中不敢再出。郓城民国七年之大乱，到民国八年春天即平静。

他从乡间走来

——记我县已故民间艺人唐玉生

李秀民

唐玉生，字春轩，郓城县杨庄集乡唐店村人。一生在泥塑和绘画艺术上造诣颇深，贡献很大，是我县著名的民间艺人。他虽已去世几年，但他在艺术上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了让后人了解他，学习他的可贵精神，我多次走访熟悉他的同志及其弟子，综合起来写成这篇文章。

唐玉生于1909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父亲以扎纸为业，经济收入微薄。为了维持生活，玉生的奶奶就在本村集上当了鸡鱼经纪（称秤），挤磨点零星花销，虽然家庭清贫，日子也勉强过得去。天有不测风云，玉生四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撇下了

老幼寡母三口人，生活真没法过了。父亲临终前把小玉生托付给邻村的一个结拜兄弟——仝大庙村的李品高。

李品高是画庙师傅。他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着阶级兄弟的重托，他爱小玉生的聪明灵利，他爱小玉生的活泼好动。为了赶庙活，李品高师傅常常褡子的一头放绘画用具，一头放一个欢蹦乱跳的小玉生……

玉生年龄稍大了，师傅有力地大手，就领着这只娇小纤细的手，开始了他浪迹江湖的艺术生涯。由于长期受师傅的影响，玉生也成了个小画迷。见师傅画，他也画。他胆大心细，模仿能力强，对于师傅的一笔一画，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师傅画狮子老虎，他就画珍禽异兽；师傅塑泥胎，他学捏泥人。并且和师傅作的一模一样，维妙维肖，师傅常常满意地拍着他的小脑瓜：“好孩子，有出息……”

每逢师傅揽了活，别看玉生年纪小，但也忙得不亦乐乎，帮师傅和泥递笔，抹墙上色，成了师傅的得力助手。看着他鼻梁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师傅心痛地说：“我这辈子不识

字，够苦的了。要不是咱两家都穷，我一定送你去念书，进个黉门秀才啥的。”玉生理解师傅的心思，就诚恳地说：“三叔，我不嫌累，我愿意跟你学画塑神，哪怕跟一辈子也行。”师傅凄然地点点头，但心里涌起一股酸溜溜吐不出的滋味，发誓一定要把他拉扯成器，并让他超过自己，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充实异姓兄弟临终交给他的遗骨。

春去夏来，秋去冬至，二十年过去了，师傅领着他走乡串户，跑遍了整个运河以东，教会了他高超过人的手艺。玉生虚心好学，求知心强。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画得好的，他不怕路途遥远，往怀里掖两个干粮，慌忙赶路。直到看得心满意足，方能打道回营。

玉生养成了不脱衣睡觉的习惯，有时半夜三更爬起来就画。多少个冰冷的长夜，独对清灯，象一个饥饿的人趴在面包上啃。他撕了画，画了撕，没有名师指导解说、批评修改，他就自己潜心攻习。多少个方正倾斜的多面体，使他彻夜难眠，又有多少个奇观异景使他废寝忘食。他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小画匠，如

得水的小鱼，活跃在济宁地区一带，在他所做过的典型庙活中，如我县潘渡塔寺，王井乡槐墩庙。在槐墩画庙期间，曾和河北的两位画师有过激烈的竞争。一些人对他冷嘲热讽，极端蔑视。艺术是没有偏见的，它正告诉人们，这项桂冠应该属于唐玉生！

那时的唐玉生，在山水、花鸟、人物、泥塑等多方面已有相当的造诣。他曾先后表画到过西安、天津、河南等地。他把民间传统泥塑和现代国画融为一体，有的作品发挥了自己创作独特的艺术构思。他画的《采莲图》，窈窕古装淑女坐在船上欲摘垂露欲滴的红荷，观其画如闻到清晨湿漉漉荷花飘散的浓郁香味。他的《狂奔的狮子》，画面上呲牙咧嘴的狮子，古松向左倾斜，似狂风大作，骤雨倾盆，如闻狮子怒吼、霹雳雷鸣。他的艺术既有温柔静謐，又有粗犷豪放，古老的色彩与现代墨趣的结合，创造了和谐的典雅之美。在整个鲁西，他已享有较高的声誉。

由于受家庭的拖累，1946年，唐玉生回本村集上当了交易所交易员，1947年任六区税务

所主任。当时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着鲁西南大地，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在作垂死挣扎。革命与反革命进行了刀光剑影的武装较量。唐玉生走出了税务所，投入革命熔炉之中，凭他几年来刻苦自学来的书法技艺，冒着枪林弹雨在大街小巷宣写着一幅幅“打倒蒋介石反动派！”“打倒还乡团！”等标语。

后因受他人出卖，他在六区被捕。当时的六区区长唐振华隐避乡里，因是同姓，国民党把他当成了区长，一股怒火向他发泄。从鼻眼里灌凉水、过电、用火香燃遍全身。尽管敌人不择手段地严刑拷打，玉生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只是用愤怒的目光瞪着这群发了狂的野兽。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得到一字口供。

我军正在乘胜前进，继而又解放了郛城。国民党拖着他们认为是区长的唐玉生，狼狈逃跑到徐州。当时提审他的国民党军官林参谋，知他是个税务所的小职员，并不重视，听说他会画画，只是满意地点点头，说：“等有空给我画张相，”从此打入牢狱，再无人过问。后与

巨野县鄆屯村的一个人结伴越狱逃跑。

解放后，唐玉生参加了平原省在金乡举办的工艺美术展览，他的作品很受艺术名流的称赞。平原省决定把他留在省城，从事专业的创作。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可他谢绝了。他离不开家乡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他离不开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他的作品。是家乡的大自然赋予他美的感受，美的结构。黄昏西天边火红的晚霞，早晨烟波浩渺的宋江河，宋江河堤上松柏杨柳，路边沟坎上的奇花异草，都需要他去描绘，去创造，他怎么能图终生的安宁而留居省城呢！

他曾在县建筑公司兼油漆工，也搞一些门窗设计工作。在这期间，他又多次被抽调文化馆工作。1958年他帮文化馆开办了农业展览，65年、66年又在文化馆办了阶级教育大型全套泥塑展览。当时他的作品受到全县人民及艺术界人士的赞赏。他被选为县政协常委，担任文艺代表。为了贯彻婚姻法，他曾多次通过漫画来宣传如何解放妇女，使她们在中国与男子占有同等的地位。

1966年轰轰烈烈的横扫四旧开始了，他也象一批老艺人一样被赶回家去。在这场压抑与摧毁艺术的年月，对于一个热衷于绘画艺术的唐玉生来说，停下笔，实在是一场灾难。但在这场灾难面前，他并没有自暴自弃，除了画毛主席像外，他还画一些不妨碍当时社会运动的东西，如花鸟，以多种艺术形式来丰富自己的实践，挖掘并开拓自己的艺术创造潜力。

当时他虽是个护堤员，生活过得相当贫困，一日三餐煮红薯，只吸七分钱一合的烟，有时连盐都吃不上。有时，他默默坐在河边，双手托腮面对滚滚东流的新郢河水，心潮汹涌。真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慨。唐玉生变了，从一个白白胖胖的画家，到一个黝黑十足的庄家汉。

1973年他在县外贸局工作，后被菏泽外贸聘请，从事各种动物、彩蛋样品制作，他多次参加菏泽地区美展。他制作的皮毛画更是栩栩如生，一只立体老虎能换回一辆外国汽车。他还曾到青岛给日本人作现场表演，博得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好评，使他们感叹中国大地竟有如此

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他又多次参加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他的工艺品曾畅销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年逾花甲的唐玉生，一鸣惊人，又一次活跃在艺术的舞台上！

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一批老艺人的公职，唐老因年老多病退休，于1983年4月22日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唐老为人正直，一生坎坷，生活清贫，没有固定职业，但他轻名利，不求升官发财。在他一生所追求的绘画艺术上，成绩卓越，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艺术珍品。

状元张宪周

杨彩云 苗冠五

张宪周，字道东，城西张楼人。生于清同治壬戌年间（1862年），为郟城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

张宪周自幼聪明好学，尤喜习武。其父兄于村外置96杆长的场地，供其跑马射箭。所用大刀两柄，一重120斤，一重180斤，皆浑铁打成；所用弓，牛皮为弦，犀牛角为架，需300斤臂力方能拉开。因此，被誉为“神童”。弱冠即中秀才，光绪庚寅年（1890年）发解，名列五魁。同年恩科加试，在金殿与山西王金钩比武。张宪周打马疾驰，身稳如山，盔缨纹丝不动，120斤重的大刀耍动如风，不意一个闪失，刀落在地。张宪周眼明手快，旋即用脚尖一挑，便飞接在手。比武的第二项是举誌石（誌石为古代举重器械，重三百六十斤）。只见张宪周运足气力，喊了一声“起”！志石稳稳

举起，三起三落，又复放一百八十斤大刀于上，高举过顶，绕场一周，从容自若，合场上下欢声雷动。而山西王金钩举誌石刚两下，已面色大变，汗如雨流，扔下志石羞惭而退。光绪帝遂点张宪周为武状元。故京城一时流传“点了张宪周，气死王金钩”之民谣。1891年状元奉旨为陆部朝参镇殿将军，金殿之上持刀而立，威风凛凛。1894年赴任开州（今河南濮阳）协镇，爱民若子，治安言善，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商有余财，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无不交口称赞。后迁任崞关、娘子关从一品参将。初到之时，盗贼充斥，杀人越货，为害乡里，民不聊生。状元随率兵平匪，身先士卒，歼敌于铜家堡，梟其元凶，使地方大治。又重农治本，兴修水利，引水于阡陌，耕种于农时，五谷丰登，歌舞昇平。任满朝见时，百姓依依相送，赠旗锣伞牌，一路飘飘扬扬。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京畿失陷，光绪帝和西太后着农装惶惶西逃，洋夷闻讯分道追驾。状元勤王护驾，行至居庸关利用山高谷隘，埋兵布阵，以

逸待劳。敌后，出其不意，率众堵截，白刀相接，七首抨击。敌纵有枪炮亦无可施展，大乱之中惶惶应对，而枪上刺刀终不如大刀长矛灵便，于是斩敌首级千余。联军大败而逃，不复敢回，叹曰：状元军厉害！光绪帝化险为夷，居西安龙德殿召状元曰：“挽狂澜之既倒，支大厦之将倾，乃社稷之臣，诚功莫大焉。”后返北京，御赐金字匾额“捍御功伟”，至今犹存。

之后，状元被委任兖州镇守使。尚未赴任，却被他人从中做梗，用重金将顶子买去提前充任。状元愤而返乡，不再出任。状元两袖清风，家户无人，仅几间民房几亩薄田。返乡后亲躬田亩，自食其力。于民国三年（1914年）郁郁而死，享年五十二岁。

深受拥戴的知县——戴茅草

赵洪玺

戴伟，明朝嘉靖时人，字道夫，号西衢，郟城县肖何亭人。他幼小丧父，母亲吴氏贤慧善良，知书达理，好善乐施。戴伟在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为人忠诚正直，勤奋好学，于嘉靖丙午科中举人，己未科中进士，皇封安徽砀山县令。他在任砀山县知县期间，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为官清正，政绩卓著，颇得百姓的拥戴，并被誉为戴青天。因曾有奖励百姓开荒创茅草的事迹，人送绰号戴茅草，戴茅草的事迹距今虽已六百余年，但在砀山和郟城两县，至今仍广为流传，

戴伟考中进士，皇封砀山县令。上任前，母亲为他做了一件马褂（即坎肩），亲手给他穿在身上，马褂无袖，有“不要把手伸长”之意，并千叮咛万嘱咐：“要为官清正廉明，不可贪赃枉法，不能为祖宗落下骂名……”戴伟

点头称是。他在上任的路上就下定决心：不辜负浩荡皇恩，不辜负慈母教训，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使碭山的百姓安居乐业，得以温饱……

一入碭山县界，他看到的是田园荒芜，茅草丛生，到处一片荒凉景象，老百姓亦面黄肌瘦，衣衫褴褛，逃荒的不绝于道。真乃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戴伟看到这些，忧心如焚。接任后，他一不拜上司，二不拜乡绅，立即到乡村去察看民情。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的村寨，访问百姓数以千计。

原来这碭山县土地瘠薄，到处是非沙之土，加之封建官府只知横征暴敛，不注重发展生产，致使田地失耕失种，茅草丛生。通过调查得知，非沙之下本是淤土，如经深翻，定可改造成良田。

戴知县摸清了情况，就马上逐级上报，直至上疏朝廷，要求减免该县赋税，放粮赈济百姓，帮助恢复生产。但封建皇帝不管百姓们死活，对戴知县的奏章置之不理。戴又转递奏章

数次，结果上司动怒，示下：免税一年，不准再奏。

戴知县考虑到，自己是一县之主，只有为国分忧，为民解难，才不枉为百姓的父母官。他又联想到历代清官为百姓把个人置之度外，象包文正用家庭财产放粮赈济陈州百姓，于是他决心用自己的奉禄和家庭财产来恢复和发展碭山县的生产！

决心既定，他飞马赶回家乡，向老夫人申述了碭山县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老夫人是位深明大义的人，对他的想法大加夸奖，极力支持。于是把家里库存的金银、铜板、青钱拉往碭山，并变卖财产，以备后用。

戴知县回碭山后，召集亭、里、保、甲长商议，改变碭山贫困面貌的关键是消灭茅草，变荒地为良田。为了激发百姓创茅草的积极性，确定收购茅草，并布告全县百姓，凡开荒创得的茅草，县衙一律按价收买，三个青钱一斤，每户垛一垛，垛上挂牌，注以户主姓名，创多者奖，谁创的茅草最后仍归谁有，以便饲养牲畜，谁开的荒由谁耕种，免交赋税一年…

…全县设茅草收购点五处，以便利百姓。

布告一贴，很快传开，这样既可开荒种田，又可换钱，买米下锅，于是全县百姓欢声雷动，刨茅草的遍于田野，送茅草的不绝于道，外流他乡的闻讯也纷纷归来，从此，荒凉萧条、死气沉沉的碭山又有了生机。

经过一冬一春，刨的茅草堆积如山，荒地开垦了约三分之一，加原有良田三分之一，全县可耕地达三分之二。但百姓所得茅草钱仅可糊口，仍无钱买种子播种，加之地广人稀，还需增添耕地牲畜。戴知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又二次返乡，卖地十顷，卖房四十余间，又变卖了家俱等，然后用这些钱款在郓城一带买了棉花、高粱、谷子、大豆种子，用铁轮大车运往碭山。从肖何亭至碭山，一时车来车往，络绎不绝，群众传说，把路基都轧翻了。

在戴知县的带动和感召下，碭山其他官吏和当地开明士绅也纷纷捐款或借款给百姓，基本满足了全县春播所需的种子，并按一百亩地一犍子配齐了牲口，还发动百姓撅刨锨翻、拉

犁拉耙，保证了及时播种。

经过深刨茅根和耕耘，砀山县的非沙地变成了二合土或蒙金地。大豆、棉花等作物又喜新土，春季苗全苗旺，人心稳定；秋季高粱红、谷子黄、棉花银白，好一派丰收景象，百姓喜气洋洋。只一年，砀山县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第二年，继续开垦荒地，精耕细作，又获得了好收成。第三年砀山县出现了大治局面，正象戴知县上任前所憧憬的那样：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路无拾遗，夜不闭户，男盗反正，女娼绝迹……。这真是“一片丹心扶社稷，两只赤手挽乾坤”啊！

砀山县百姓们想想过去在死亡线上挣扎之苦，看看今日生活温饱幸福之甜，哪有不感戴为救百姓而呕心沥血、倾家荡产的父老官之理？他们不约而同的呼戴知县为戴青天，为纪念开荒刨茅草之事，又送外号戴茅草，并赠送匾一块，上书“民之父母”四个大字。

戴茅草在砀山任知县后期，曾有两次升迁机会，但百姓城门挂靴，跪衙抱腿，泣不成声，

苦苦挽留，使其不忍离去。他爱碭山的山山水水，爱碭山勤劳善良的人民，与碭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向上司和朝廷毫不惋惜的婉言谢绝了“顺德府通判”的职务。他在碭山作知县二十余载，直至告老。

戴知县告老还乡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久便谢世，享年六十九岁。碭山人民闻讯如丧考妣，哭声雷动，选派代表数十人来肖何亭奔丧。为纪念他的功德，碭山县人民争先恐后捐款，在碭山县城修建了一座戴伟庙，常年祭祀，香火不绝。至明末，香火庙年久欲坍，清初又重修了一次，直至“十年浩劫”古迹遭毁。

因为戴伟在碭山做了清知县，碭山县的群众世世代代对其感恩戴德，后来发展到肖何亭与碭山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据群众传说：几百年来，肖何亭的群众到碭山去做买卖或办事情，住店不用交店钱，吃饭不用付饭钱，如果推着重载车子走在路上，自会有人帮忙推拉……，此俗至今尚存。

郓城县天主教的 创设、发展和现状

侯京起 口述 王锡亮 整理

根据多次同年长者座谈，以及本地区的传说，我把天主教在郓城县的创设、发展情况，综合谈一下。

郓城天主教的创设

约在一百一十年前，黄河从濮鄄地区四马处决口。洪水肆虐，滔滔滚滚，郓城一带平地水深数尺。百姓的家产冲洗殆尽，无以为生，不得已成群结队，向阳谷县坡李庄一带逃命。

当时，德、意、荷兰等国的布教神甫，已在阳谷县坡李庄一带划为教区（根据天主教的规定，发展教友2000—3000人，才准划为一个教区）。天主教在难民集聚于阳谷地区的十个月里，每天三次施舍大窝头以救济难民。可是要蒙受此种施舍，难民必须愿意念天主教的经，

也就是必须信奉天主教。在天主教对难民广施仁慈、长期救济的感召下，难民们谁还能不信奉天主教呢！

黄水下去后，难民们陆续回到本乡本土，多数还是继续念天主教的经文。神甫们借慰问难民之机，偷来郟城传教。开始未敢进城，安住在郟城西北的宋堂。以后逐渐发展，教友慢慢多起来，才把郟城发展为一个教区，天主教堂设立在城内。

郟城天主教的发展

它之所以发展，首先因为天主教以讲仁慈、博爱为主，再则神甫们多数通晓医术，办红十字会，办医院等慈善事业，这是天主教得以发展的原因。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寇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农民安土重迁”，逃荒不易。迫于此种情况，农民信奉天主教，躲避在天主堂内，以保全家生命财产的户越来越多，因此达到了天主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教友究竟有多少，虽已无法调查，但已发展为郟城、陈坡、邵集三个教区，教友数目之大，可想而知了。

郓城天主教的现状

抗日战争胜利后，德、意、日等帝国主义的神甫们全离华回国了。中国神甫们，素知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不符合共产主义，不敢再宣传教义了，教友们也不敢再公开地信奉天主教了。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借天主教作护身符的，有些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教；二是真相信天主教的，不敢明说，只有自己暗暗念天主经。此时已到衰败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原来的天主教神甫和教友才心情舒畅了。大家都表示，一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力量。

郓城水浒酒厂的历史

渊源和现状

郓城是梁山将首领宋江的故乡。素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说。水浒英雄当年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广聚天下豪杰。1969年在宋江故乡水堡出土的酒坛上刻有这样的诗句：“罗列三千馆，清香第一家，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据考证属宋代产品。可见早在宋代郓城的酿酒业已很发达。解放前，全县民间酿酒作坊数十家，产品销售周围十几县。现在的郓城水浒酒厂，即是在历代遗留下来的若干作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断发展，酒厂已初具规模，尤其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创新，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现已生产白酒四个系列近四十个品种，年生产量为2500吨，1987年被轻工业部授予“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光荣称号。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

亚、意大利等地。水浒老窖自83年以来一直保持省优良产品称号，1987年获省优质产品称号，经中国白酒协会及省有关专家鉴定为独特的芝麻香型白酒。具有绵柔回甜、酒香浓郁、酒体协调、窖香兼芝麻香的独特风味。中国白酒协会会长秦含章曾写诗赞曰：“梁山豪杰世传扬，水浒琼浆昨品尝，独特风韵粮食酒，共同确认芝麻香。”本厂生产的水浒特曲1988年在西安举行的首届酒文化节上誉为中国文化名酒，并在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水浒老窖荣获金牌，水浒特曲获银牌，水浒酒获铜牌。今年，经过大胆钻研创新、又推出39°、44°低度水浒酒，受到广大消费者及有关部门的好评。郓城水浒酒厂将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前进。

政 协 郢 城 县

第七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 王锡亮

委员 于长茂 马玉斋 陈子云

祝令才 宋宝三 崔如现

王锡亮

政 协 郢 城 县

第八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 王锡亮

委员 祝令才 于长茂 陈子云

丁葆成 苑继贤 宋宝三

韩效珠 宋汉鼎 张效苏

侯英林 王锡亮

封面题字 徐雷健
封面设计 李兴平
责任编辑 王锡亮 祝令才
校 对 张效先 张洪卿

4.00

郓城文史资料
第四集

编辑 政协郓城县文史委员会
印刷 山东省郓城县印刷厂
一九九〇年一月